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11 期（总第 359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11 月 5 日

-
- ◆ 有序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叶兴庆(1)
 - ◆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楼继伟(6)
 - ◆ 新时代的三大法宝.....刘济民(9)
 - ◆ 高度重视对我国古代科学家成就的宣传.....郭书田(12)
 - ◆ 从调研中看国农业现状与发展.....许善达(20)
 - ◆ 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李旭东(23)
 - ◆ 乡村产业振兴的“白马样本”.....刘 力(30)
 - ◆ 昆山农村飞速发展面对面.....张树成(34)
 - ◆ 村庄与长城.....郭于华(38)
 - ◆ 青海祁连行.....鲁 青(41)

有序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

叶兴庆

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决策也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推进这项改革，既回应扩大宅基地流转范围的社会诉求，又有效防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让宅基地“用起来”而不是“炒起来”，应当从宅基地产权结构及其有序开放的视角切入。

一、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是如何受到严格限制的

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宅基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由各户长期使用后，形成了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户的“两权分离”格局。尽管宅基地“两权分离”比农用地“两权分离”早近20年，但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的扩大过程却更为艰难曲折。

（一）从宅基地成员使用权看，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获取渠道先松后紧

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重要表现之一。早期阶段，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远大于市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对非农业户口居民到农村申请宅基地建房并未严格禁止。1982年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曾规定，“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職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甚至还规定“集镇内非农业户建房需要土地的，应提出申请，由管理集镇的机构与有关生产队协商，参照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即使是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此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方面与本村村民仅有两点不同：一是需要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二是需要支付费用。

随着农村各类建房占用耕地的增多，为加强耕地保护，国家开始控制非农业户口居民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住宅。1990年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请示的通知〉》提出，“对不合理分户超前建房、不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和非农业户口的，不批准宅基地”。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的申请主体由“农村居民”修改为“农村村民”，删除了1986年颁布和1988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可以使用集体所有土地建住宅的规定。至此，非农业户口居民申请使用集体土地建住宅的口子被彻底堵死。

（二）从宅基地流转使用权看，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多数情形下被排除在受让方之外

宅基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房地分开、差别赋权”，对房屋赋予农民完全产权，对宅基地仅赋予农民占有和使用权。但现实中房地难以分开，往往是地随房走。因而，农民已经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两种情形而定。

一是宅基地使用权不能直接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历来严格控制。

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98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强调，分配给社员的宅基地，社员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买卖和擅自转让”。1982年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相应规定，“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1982年《宪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出租、转让，也不得抵押、担保、继承。这意味着，无论受让方是城镇居民还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农村户籍人员，都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直到2007年，国家层面才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年发布的《物权法》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该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宅基地只能转让给符合条件（无宅基地或面积未达到标准）的本集体成员”。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中，可以有条件地在本村农民之间流转。例如，2016年出台的《大庆市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村民因升学、就业、当兵、民办教师转正等情况不再使用宅基地的，允许在本村内流转，但必须按‘一户一宅’的原则进行”。

二是随住房财产权流转而相应发生的宅基地使用权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流转，早期并无限制，后来被明令禁止。国家对农民房屋的流转持较为宽松的立场。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196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以及随之转发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整理的《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明确规定，“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和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1986年颁布、1988年修正、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均规定，“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意味着直到1998年，农民的住房是可以出卖、出租的，但对受让方和承租方并无明确规定，理论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通过购买农民住房而间接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但从1999年开始，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民住宅，相应堵死了城市居民通过地随房走、间接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通道。该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提出，“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200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将禁止的对象范围由“城市居民”扩大为“城镇居民”。2004年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将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出卖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村民将农房出售给非本村村民，后因房价暴涨而反悔、引发纠纷，只

要诉至法院，一般会判决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自 1999 年起国家层面明确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民住房，但对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村户籍人员购买农民住房并无明确禁止。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意味着，农民住房仍能出卖。从一些地方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来看，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符合“一户一宅”条件的农户才是合法的买受方。例如，2002 年出台的《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农村村民因继承等原因形成一户拥有二处以上宅基地的，多余的住宅应当转让”，“受让住宅的村民必须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浙江乐清等地曾把允许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县域内其他农业户籍人员购买农民住房作为改革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时，安徽省也曾宣布把“建立农民通过流转方式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制度”作为重大改革举措。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便是农村户籍人口，如果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样不能购买农民住房。既然农民住房不能出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农村户籍人口，宅基地使用权也就不能经由此途径间接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农村户籍人口。

一种例外情形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房屋可以间接获得宅基地使用权。2011 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办、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规定，“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这意味着，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而间接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得到确权保护。2015 年，上海市发布的《关于加强本市宅基地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也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等占有的宅基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通过村民民主自治管理，探索实行有偿使用”。

二、以顺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大趋势、保障外来人口居住需求为目标，有序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

目前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较低，外迁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缺乏顺畅的退出通道，外来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缺乏顺畅的进入通道。这种局面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采取突破性举措加以改变。总体思路是：“‘三权分置’、差别赋权，立足存量、先房后地，保障居住、拒绝投机”。“‘三权分置’、差别赋权”，就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成员使用权的基础上，着力放活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流转使用权，赋予集体所有权、成员使用权、流转使用权不同的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立足存量、先房后地”，就是停止宅基地的福利分配、着力提高存量农房和宅基地的利用率，优先扩大现有农民住房财产权对外流转的空间，稳慎扩大宅基地使用权对外流转的空间。“保障居住、拒绝投机”，就是扩大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的出发点是满足外来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实际居住需求，同时要防止资本圈地和游资炒作，防止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蔓延到乡下，真正做到住而不炒。

（一）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可通过置换等途径在不同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流转

除了国家征地以外，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是不能通过买卖实现流转的。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能在本集体土地上申请建房，造成画地为牢、分散布局，不利于发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不利于村镇体系的调整优化和中心村、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一些地方通过置换的方式，把 B 村的部分土地置换给 A 村，引导 B 村农民到 A 村建房，改善了 B 村农民的居住条件，实现了 A 村宅基地所有权向 B 村的开放。应总结和推

广这类做法，为居住分散、愿意到城镇周边和条件较好村庄得到一块宅基地自建住房的农民提供制度上的空间。

（二）宅基地成员使用权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但为给放活流转使用权创造条件需要进行铺垫性改革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国家相关政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可以按照“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限定面积，无偿分配、长期占有”的制度框架申请和使用一处宅基地，取得具有用益物权属性的宅基地成员使用权。这种宅基地成员使用权，类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成员权为基础的“身份资格权”与以财产权为属性的“使用权”的复合体。由于成员权是集体所有制的核心、不可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因而宅基地成员使用权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可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在此基础上，放活的是从成员使用权（类似农户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流转使用权（类似承包地的经营权）”。为放活流转使用权，需要对成员使用权进行铺垫性改革：

一是对超占部分实行有偿使用。目前农村普遍存在超标准占地、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等问题，造成成员之间宅基地占有不均。一旦放活流转使用权，实物占有上的不公就会显性化、货币化，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借鉴四川省泸县等地经验，对超占部分，能清退的清退，不能清退的实行有偿使用。

二是停止免费申请。免费申请宅基地建房，是成员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农民住有所居的重要制度安排。但造成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特别是老成员的宅基地不退出、新成员免费申请宅基地建房，造成宅基地闲置与村庄建设占地持续增长并存。如果放活流转使用权，势必刺激一些地方的农户大量申请建房。鉴于城镇规划区外的乡村人口总量在持续减少、存量闲置宅基地大量存在，城镇规划区内实际上长期无宅基地可分，停止宅基地福利分配的条件日渐成熟。在矛盾突出的地方，可选定一个改制时点，作一次性了断，对符合一户一宅条件而没有分到宅基地的给予补偿。

三是明确使用期限。与土地承包期有明确的年限、经营权流转期限不能超过剩余承包期不同，宅基地的成员使用权没有明确的期限，一旦放活流转使用权，就无法对流转使用权的期限进行规制。可考虑以改制时点为起点，明确成员使用权的期限为70年，到期后家庭成员仍在实际居住的顺延70年，没有家庭成员实际居住的可以依法自愿有偿退回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以缴纳土地使用费为条件由不在村继承者继续持有；流转使用权的期限不超过成员使用权的剩余期限。

（三）流转使用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开放性

一是从受让对象看。按县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县域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下乡创业、下乡居住的优先序，逐步纳入受让人范围，且要严格限制受让宗数和面积，防止圈地和炒作。

二是从流转用途看。以满足外来人口自住、发展休闲观光养老等产业为主。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禁利用流转来的宅基地建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三是从流转主体看。可以由集体成员独自流转，也可以由村集体成立农民住房合作社统一流转。为规范市场秩序，可以由地方政府对流转合同进行鉴证。

四是从流转方式看。鼓励发展农房出租，可以短租，也可以长租；可以整体出租，也可以分割出租。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闲置农房和宅基地，或者自营，或者出租，或者以使用权与外部工商资本联营、合作，发展休闲观光养老等产业。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外部人员合作建房，分割给外部人员的部分可界定为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权到期后由成员使用权人收回并恢复为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所占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抵押，处置抵押物时的受让人不必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可比照前述受让人优先序。允许农民住房财产权继承，所占用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继承，如继承人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需向土地所有权人缴纳有偿使用费。

三、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

（一）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办法

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本质上是要将原先仅限于集体成员持有的部分权能让渡给非本集体成员。这就涉及到对集体成员身份的界定。有四个核心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存量成员的界定。可综合考虑历史因素、目前居住地、对集体成员权的依存度等，选择一个改制时点，一次性确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各地在这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可将成熟的经验提炼、总结为一般性规则。第二，增量成员的界定。鉴于集体成员的就业结构和居住地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成员权对不同类型人口的重要性存在较大差异，可考虑分两种情形确定：家庭成员全部外出、对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履行义务的，其家庭新增成员不再自动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家庭成员中有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居住生活的，其新增家庭成员如果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居住生活、能够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履行义务的，可自动获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第三，成员权与户籍、自治组织成员分离。随着成员权的财产权属性增强，拥有成员权的人，如果进城落户，户籍可以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也可以不参加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社区自治组织。第四，允许单项成员权的存在。成员权体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申请权、集体资产份额权等方面，随着单项成员权的退出，如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一些成员可能只拥有剩下的部分成员权。

（二）加快宅基地和农房的确权登记颁证

对宅基地的权能进行分割，允许部分权能转移给非本集体成员，必须以摸清家底、建立台账为起点。首先，要尽快完成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发证。目前，一些地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依然滞后，有些地方已颁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只确权登记到行政村农民集体一级，没有确认到每一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应尽快采取措施高质量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对历史原因造成的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纷争，应尊重现实，稳慎解决。其次，要尽快完成宅基地成员使用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应按不同时期的政策口径分别掌握，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对超标部分，能清退的必须坚决清退，因不可分割而不能清退的必须实行有偿使用，并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中注明。

（三）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扩大宅基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进行修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对《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了两轮审议，从目前的修正案看，还不能适应扩大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的需要。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涉及宅基地条款的修正力度，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留出空间。下一步，还需要加快废除《物权法》和《担保法》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不得抵押担保的相关条款。同时，需要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进程，重点是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治理结构、成员权的界定和权能范围等进行规范。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研究员）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

当前，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掀起，特别是最有实力的发达国家挑头，使得不利的世界变局短期内不会结束。中国怎么办？党、政府、企业、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必须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度，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管理机制，政府的职能定位、作用方式等发生了全面的正向变化，而且是根本的不可逆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最近 5 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举措和新任务。在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方面，提出的第一条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即生产要素一侧，也就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侧的结构性改革，借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典语句，就是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实早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当时总的提法还是“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要求各类市场主体是平等的，交易是自由的，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是自由流动的，交易产生的价格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政府要创造环境，做出制度规定，实施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按这样的分析框架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优化，我们发现，资本要素的制度构成十分广泛，既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形式，也包括财政和金融市场的改革等。在这些领域，各方面已有大量论述。下面重点分析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的制度性扭曲，以及可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想。

劳动力和土地的城乡二元制体制，造成了城乡二元制结构，这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公平正义的制度性下行力量。农村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大量的农村住宅闲置，甚至农用地荒废。农民工栖居于城市边缘，但随迁子女上不了学，故乡又很难回去。一些小有成就的早期进城务工者，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女和老人都迁入大城市，但等子女到了高中阶段只能回乡，有的在县城租房上学，有的甚至尽其所能将子女送到国外上学。“人户分离”造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问题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现行户籍管理是重大不合理的制度问题。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解决“三个一亿人”城镇化问题。各地也在行动，落实改革决定。但由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和人员自由流动困难造成的公共服务接续困难，这项改革难度很大。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关的更大问题是城乡土地制度二元化。城镇土地为国有，按照土地规划，政府进行公共用地和生地的“三通一平”开发，按不同的期限将熟地拍卖给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商，用户买到房产及连带的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民法规定，使用权到期后自动延期，但未说明是否需付出对价。农村土地为集

体所有，分为农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用途不可改变。农民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农地的承包权，承包权在集体成员之间分配转让。农民举家迁到城镇，名下的农地分配给其他成员承包，还要将宅基地无偿交还集体。这样一种农村土地制度，妨碍了农地集中使用，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不高，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按照经济规律，农民自愿进城务工，但受各方面原因所致，很难在城镇落户，留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即便举家搬离的农户，有什么激励愿意将宅基地交还集体？有关资料显示，欠发达地区的宅基地至少废弃四分之一以上，宝贵的土地大量浪费。

土地不能集约使用，农民难以迁入收入更高的城镇就业，农村居住过于分散，则公共服务的覆盖成本过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但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努力是不懈的。可以观察到，县城的房屋被出租或买下，用于长辈陪着子女争取好一些的教育，在外打工的父母辛苦供养他们，有多少家庭分离？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还造成了城市土地利用率高，规划严重不合理，大量的城中村和城市周围土地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城镇的扩展只能通过政府征地拆迁、土地变性才有可能。愈来愈高的生地变熟的成本，使得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愈来愈高，严重推高了房价。这又损害城镇人民的生活，农民入城也更为艰难。这种二元结构除了损害社会，对经济的损害也十分严重。农村户籍人口还有约 50%，实际务农人员也超过 30%，务农收入远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产业的速度大幅缩减，企业招工难、招工贵。刘易斯拐点提早到来。不要忽视，刘易斯拐点的分析假定劳动力流动和土地使用的转换是自由的，是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拐点”提早到来，福利损失巨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方法用于劳动力和土地生产要素，目标是清晰的。劳动力应当自由流动，不应有身份不同的区别对待；土地应当在用途管制之下自由交易，实际上是交易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相应的政府公共服务要覆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就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改革任务。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相通的。

围绕如何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解决二元体制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个最大痛点，提出如下初步设想。

首先是土地。对现有的城镇土地制度，既然主流意见从未质疑它不是社会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适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制度引入农村，从而实现制度的统一。具体可以考虑：（1）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农地的长期承包权转为相应期限的使用权，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也改为长期使用权。其中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要用容积率加以确定。（2）使用权在国家用途管制下，可自主使用也可自由出让，不限于原集体成员之间。转让时不得转换土地用途，除非用途管制规划做出调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原集体成员所有，可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可自由出让。受让方在管制规划范围内，改变土地用途或扩大容积率，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应使用权的对价。

（3）政府除公共用途外，无必要也不得再征用农村土地。在土地收入方面，政府除了获得相应的使用权转让对价外，通过开征房地产税获得收入。④要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对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在确权基础上，容积率规定范围内的收益归原土地使用权持有人所有；超出规定范围又符合规划的，归买房者所有，但要分期支付土地使用权对价。这样做，既公平又使这些房产合法化交易。房地产税的开征可以按家庭人口给予免税额，低税率起步，给予地方政府充分授权。

其次，在二元人口制度方面。（1）继续沿着“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三个一亿人”城镇化的思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由于农民解除了农村土地束缚，有意愿长期就业落户的农民可以出让在农村的土地权益，相应获得在城镇安家落户的初始本钱。（2）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要求，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继续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进而打通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农村社保与职工社保的衔接。推进“租售同权”，推动居民平等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政府不再以户籍控房，不再以房屋所有权控制户籍以及接受教育的权利。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使之逐步一元化，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释放劳动力扩大就业，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效益，进而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是有益的；对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平抑房价高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维护公平正义，是有益的；对于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进一步释放被压抑的人口红利，是有益的；对于民粹化盛行，主要国家单边主义政策造成的全球不利影响，夯实国内基础，内部开放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是有益的。经济分析表明，对于大国来说，内部开放比对外开放更为重要，效果更加深远。

此外，还有两点背景思考。

第一，关于公民迁徙居住权问题。1949年具有代行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规定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五四宪法”延续了这一表述。随后全面向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靠拢，物质短缺，基本生活用品和住房等采用票证和行政分配的办法，与之相应的，公民丧失了迁徙和居住自由权。1975年“文革宪法”正式取消了这一规定。“八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做了改进，但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恢复。当时仍处于票证经济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商品化还未开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没有恢复这一规定的条件。“八二宪法”之后，改革开放实质性开展，特别是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改革开放进一步加速，人民基本生活用品和住房商品化。在政府层面，通过数十个文件的方式，逐步扩大了公民的迁徙居住自由权。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改革新任务，从最高阶法律层面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列入议程，拖延愈久，社会问题愈多，矛盾的积累愈大，解决起来愈困难。

第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实行了土改，农民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此后，经过农业合作化改造，结合借鉴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推行“一大二公”，建立起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开放之后，集体所有单位下放到行政村，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推广长久承包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建设用地在用途管制下同等入市等改革探索。但最基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框架没有破除。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根子来自计划经济，城乡二元体制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市场、自由流动的要义是相悖的。在农村引入城镇的土地管理制度，是更高阶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含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深入骨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述两个基础性的制度缺陷，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冲破过时的条条框框。由于长期积累，矛盾和棘手的问题相当多。面对问题，要实事求是采取逐步缓释的措施，而且这些问题也确实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

（作者：财政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新时代的三大法宝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发言提纲

刘济民

编者按：这是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刘济民同志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在总结 40 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的三大法宝：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高举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内容详实，分析深刻，值得细读。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非常振奋，深受教育，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完美地对 40 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独特经验，作了高水平的全面系统的总结。

大会开得庄重热烈，生动活泼。还有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的现场互动；100 位改革先锋和 10 位国际友人的业迹，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别开生面，感人至深。

习近平总书记讲了 40 年十个方面“始终坚持”取得的伟大成就，讲了新时代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需要把握的九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那个三大法宝，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我认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把治国强国大业、治军强军大业、富民惠民大业不断推向前进，又有新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大法宝：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建党近 100 年了。我们党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是太不容易！曾经的曲折艰难，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没有经历过。

40 年改革开放，翻天覆地，辉煌巨变，极不平凡，创造了奇迹。那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奇迹，是人类奇迹，是世界奇迹！

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面临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历史转折关头。下一步走对了，走好了，柳暗花明，强国富民；如果走错了，走偏了，那就是当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下场，葬送事业，亡党亡国！

40年前的那次会议，是决定中国命运、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最可庆幸的是，我们党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们党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在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又一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奇智慧、非凡胆识和高超的领导权威。

我们党勇立潮头，力挽狂澜，硬是冲破极左的壁垒，冲垮了习惯势力等等的软弱无能，我们党成功了！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在狂风巨浪中挺立不倒，在曲折艰难中奋起自救，继续奋勇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的觉醒”！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值寒冬。这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寒冬中迎来春光！再一次开启了党和国家更为美好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人们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真正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最根本的保障，最重要的法宝，是无可替代的。

七十年前，建国之初，我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今天，我们高呼：没有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坚强有力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第二大法宝：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

40年前，我们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关键的一招”。

这是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极其宏大的改革开放，这是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创举，伟大的飞跃！这是我党领导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全国人民真正激发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改革开放的动力、活力、创造力！开启了以亿万民众为主体的、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持久而又伟大的新的长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体方案。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出了1600多项改革方案，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习近平还书说：“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40年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把千百年来、建国以来、以及新冒出来的许许多多的难题都破解了；很精彩，

很神奇，很有创意！叫做得力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改革开放。国人为之欢呼，世界为之震惊，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视之为经典！

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足以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说，那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切都变得更美好了。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真正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真正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到现在引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宣言书、动员令，是为新时代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吹响的新的号角！

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辉煌巨变、实现强国富民的重要法宝。

第三大法宝：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再一次焕发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担当起了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了。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实践，必定要有相适应的先进思想的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领航灯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无疑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法宝。

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方向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依靠这三大法宝，领导全国人民必定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加伟大的奇迹！

（作者：国务院原副秘书长；2018 年 12 月 20 日）

高度重视对我国古代科学家成就的宣传

郭书田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高度赞扬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创造性成果，并对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在昆明建立的西南联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研究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提出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李约瑟之谜”，以及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提出，为什么在近代未能出现科技大师的“钱学森之谜”。要解决这两个迷的问题，首先要详细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与贡献以及产生的原因，并能使其传承下来，不至在国际化大潮中有 2000 多年的中华民族文形成的“断层”。在北京发生“非典”期间，于 2003 年 5 月 19 日写了一篇《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名录》，收编了 29 位古代科学家的事迹。2004 年 9 月 1 日，写信给中宣部提出《出版中国古代科学家事迹与画像的建议》，刘云山部长高度重视，批给宣传局商教育部、科技部经一些知名的历史学家与科学家商议提出名单，经反复研究提出 100 名，由专家写出他们的事迹，画出他们的画像，于 2005 年正式出版发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宣传，发给全国中小学校。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回顾这件事，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以及推进科技兴国，攀登世界新的科技高峰，实现科技兴国，建设科技强国，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9 年 5 月 4 日）

- 附：1.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名录
2. 《一点建议》原件批示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名录

郭书田

2003 年 5 月 19 日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原始社会时期，传说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伏羲氏制八卦，“教民作网罟，以捕鱼虾”；神农氏“始作耒

耜，教民耕”、“治麻为布”、“作陶”、“尝百草”；黄帝夫人嫫祖养蚕、仓颉创字、制农历、造舟车、留《内经》等，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成就，都处在人类发展的前列。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四大发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涌现出大批的科学家，创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作了长期的广泛的研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化学和化工、生物学、农业、医药等以及这些学科发展的社会背景。他特别指出，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少成就，不仅在一些外国的著作中被忽视，甚至只字不提，例如最先认识磁极性和最早制铁等，而且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自己祖先的贡献。例如，1952年北京出版的一部介绍地植物学找矿法的著作，就没有提到早在梁代（公元六世纪）就开始应用。这位学者的提示极为重要，也值得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家认真反思。

当然在有记载的浩瀚的文献中，把科学技术的成就都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待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努力。

本文简略地介绍中国自然科学家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不包括社会科学）。

鲁班 建筑学家。又称公输班（般或盘），公输子，战国鲁国人。致力于工程技术、建造房屋、桥梁等，发明过很多生产工具，有巧人、巧匠之称。在南游楚国，为楚王重视。发明在水上作战的武器“勾拒”和攻城用的“云梯”。后世把他尊奉为木匠、铁匠、石匠的祖师，称“鲁班爷”。

西门豹 水利学家。战国魏文侯时邺令（今河北临漳西南）。曾破除当地“河伯娶妻”的迷信陋习，开凿水渠十二条，变水害为水利，改良土壤，发展了农业生产。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甘德 战国中期的天文学家。齐国人，亦说楚国人。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后人把魏国人古申《天文》八卷，与之合为一部，名《甘石星经》。书中精密记录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距离，以观察木、火、土、金、水五行星运行规律。所作恒星位置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在他测定的511个恒星以及石申测定的810个恒星名中，有120个恒星的位置，以现代科学加以衡量，也相当准确。原书已失，现传的是后人重新伪造。

石申 战国中期天文学家。魏国人。除著有《天文》八卷，收入《甘石星经》外，还发现日月食是天体相互遮掩现象，十分可贵。

扁鹊 医学家。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亦说齐国人。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反对巫术治病。遍游各地治病，擅长内科等各科。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用“针”、“石”、“熨”等医疗器械治疗。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在周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在秦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在秦为秦武王治病，遭太医令李醯嫉妒杀害。《史记》《战国策》中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被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因考其病案年代相距甚远，因此有人认为扁鹊系古代良医的通号，病案非出于一人。《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外经》，已失。现存《难经》一书，系后人托秦越人的著作。

李冰 战国水利学家。约公元前 256—251 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多处水利工程，以灌县都江堰最著。这是一个防溃、灌溉、航运综合性水利工程。其法使岷江分流为内、外二江，新造内江把洪水引向成都平原东北干旱地区，实行灌溉，同时又减轻岷江（外江）下游洪水压力，不致发生涝灾，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富庶之地。在分流处，用竹筐装石块作坝，此法至今仍在用。此外，他还主持了凿平青衣江的湫崖（今四川夹江县境），活导什邡等县的洛水和邛崃等县的汶井江，又穿广都（今双流县境）盐井诸陂地等工程。《华阳国志·蜀志》有记载。

氾胜之 西汉农学家。汉成帝时（公元前 32—7 年）为议郎，曾在三辅（今陕西关中平原）以轻车使者名义，倡种麦，获得丰收，即所谓“三辅教田”。后升为御史，所著《农书》，后世通称为《氾胜之书》而闻名于世。《氾胜之书》是中国第一部农学著作。《汉书·艺文志》载称《氾胜之书》共 18 篇，原书已佚，现存辑佚本，是后人从《齐民要术》和《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今以清人洪颐烜辑本为最好。此书总结出这一带农民的经验，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和“溲种法”（在种子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其次为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等，包括选种、嫁接、灌溉、复种、轮作、间作、混作等，都有阐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蔡伦（？—公元 121 年）。字敬仲。工业科学家。东汉桂阳耒阳（今湖南郴州市）人。和帝时为中常侍，曾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其制作器械，莫不精工紧密，为后世所效法。安帝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封龙亭侯。他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技术，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造纸，价格低，产量大，时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竹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也称蔡伦是中国造纸（四大发明之一）的发明人。

张衡（公元 78—139 年）。东汉天文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人。在安、顺二帝时曾两度担任执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在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创造出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也叫浑象），其星宿出没与实际观察完全相符。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发明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比欧洲早 1700 多年。创造测定风向的“侯天仪”，比欧洲早 1000 年。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原因，说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地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天文著作有《灵宪》，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明确指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即宇宙的无限性，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的远近有关。文学作品有《二京赋》、《归天赋》、《四愁诗》、《同声歌》等。原集已失。《后汉书》有传，明人辑有《张河间集》。

张仲景（约公元 150—219 年）。汉末医学家。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自幼博览群书，不满一般人士追逐权势，不问民间疾苦，有病听命巫说的现象，立志从事医学研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曾任长沙太守。在建安中，当时伤寒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症者又十居其七。他收集民间验方，钻研了《内经》、《难经》、《胎产药录》等古代医著，结合自己的实践，写成《伤寒卒（杂）病论》，其书广为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伤寒论》、《金概要略》两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倡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辩证八纲，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治法，总

总结了汉以前医疗经验，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华佗（约公元141—208年）。汉末医学家。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不图名利，拒不为官，行医民间，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施针用药，简而有效。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四、五日痊愈，一月间平复，是世界上最早施用全身麻醉术的医生。他认为身体必须经常活动，才能使饮食消化，血脉流通，少生疾病，遂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姿态，创“五禽戏”锻炼身体，流传至今。后因不从曹操征召为侍医，被关杀牢中。所著医书已失。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之作。《后汉书》有传。

马钧 三国时机械制造发明家。字德衡。扶风郡（今陕西兴平东南）人。为改革丝绌机（由五、六十蹶改为十二蹶），提高效率四、五倍。创造灌溉用的提水机具，名为“翻车”，即“龙骨水车”，能连续提水，效率也大大提高，至今有些农村还在使用，其原理比外国早1700年。驳斥“古无指南车”之说，制造了“指南车”，其原理比外国早1800年，试制了轮转式发石机，用以攻城，能连续发射砖石，远达数十米。发明宫廷中水转百戏玩具，木人可自动做出各种动作。由于造诣很深，被称之为“天下之名巧”。《三国志》有传。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南北朝时期南朝科学家。字文远。范阳道（今河北涿水北）人。他求出圆周率 π 值在3.145926—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的计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数的数学家，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他提出 π 的约率为 $22/7$ ，密率为 $355/113$ ，而德国的鄂图到157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人们把密率称之为“祖率”。他的数学著作还有《缀术》和《九章术义注》，均已失传。他编制《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1481天，是最先进的历法，对日月运行周期的数据作出非常精确的计算。他曾改造了指南车，制作水碓磨和千里船等。他的儿子祖恒修订《大明历》，求出球体积的准确公式。《南齐书》《南史》有传。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好学博览，以前人《水经》为基础，通过搜集文献和实地“访读搜渠”，撰成《水经注》40卷，详细注录了全国1250多条大小河流的走向和经过，对水道沿途的山陵、城邑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建筑名胜和民间传说等，作了生动的叙述，是一部兼有文学和史学价值的地理名著。他在孝文帝时，曾官尚书主客郎、御史中尉，秉法清勤，“权豪颇惮之”。后在关右大使任内，为雍州刺史萧宝寅杀害。《魏书》《北史》有传。

贾思勰 北魏末年和东魏时农学家。山东益都人。曾任高阳太守，精于农学。约在公元533—544年间，通过收集文献、农谚，访问老农以及自己的实地试验，写成《齐民要术》10卷92篇，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的大成，其中包括土壤、施肥、保墒、选种育种、谷物和蔬菜栽培、果木嫁接、家畜饲养与医病、食品加工和储藏等，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备的农业科学巨著。

李春 隋朝著名建筑家。在开皇大业年间（公元590—608年），设计并建成了著名的赵州安济桥（习称赵州桥）。桥址在今河北赵县城南的洹河上，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桥长50.82米，宽9.6米，石拱跨度为37.37米，拱券矢高7.23米，在拱上端左右各置两个小拱，既减轻桥身重量和桥基压力，又便于便洪，增强美观。其成就在中国桥梁史上居重要地位。

孙思邈（公元 581—682 年）。唐医学家。京兆华源（今陕西耀县）人。他总结了唐代以前历代医家的临床经验 and 医学理论，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30 卷，其后又撰《千金翼方》30 卷，两书合成《千金方》。共收集记载 800 多种药物和 5300 多个处方以及针灸，并创有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对妇科、儿科特别重视，列于卷首，主张独立设科。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在研究炼丹过程中，对火药的发明有一定贡献。《旧唐书》、《新唐书》有传。

沈括（公元 1030—1095 年）。北宋科学家，又是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人。仁宗嘉祐进士。神宗翰林学士，参加王安石变法。提举司天监，考察水利，出使辽国，整顿盐政，防御西夏。因变法失败遭贬，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撰《梦溪笔谈》30 卷，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司天监时，观察天象，绘图多幅，改造仪器，撰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曾推举卫朴修《奉元历》，提倡新历法，与今阳历相似。在数学方面，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高，求弓形弦和弧的方法）。在物理学方面，他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 400 多年。阐述凹面镜成像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也有研究。在地质学方面，他由雁荡等山的地形，认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上岩石中生物遗迹，推论冲积平原形成的过程。对当时水工高超、木工喻皓、活字印刷术毕昇以及炼钢、炼铜的方法等，都无不详细记录。他还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他精心研究药用植物和医学，留心记录有效方药，著《灵苑方》已佚。又有《良方》10 卷，附入苏轼所作医药杂说，改称《苏沈良方》。传世著作还有《长兴集》，使辽时撰《乙卯入国奏请》、《入国别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保存一部分。《宋史》有传。

毕昇（公元？—约 1051 年）。宋代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在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掺和纸灰的松脂腊，将胶泥烧成的活字依次排上，加热使腊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涂墨后即可印刷。印后卸板把活字还原，即可排印多次，比整板雕刻经济方便。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

郭守敬（公元 1231—1316 年）。元代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字若思。邢台（今河北）人。曾任都水监，开凿了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修复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使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了《授时历》，以 365.2425 日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只差 26 秒，与现行的公历《格里哥里历》的一周年相同，而比它早 300 年。《授时历》先后施行 360 年。创制和改进了测定星体运行位置的简仪、测定太阳坐标以及日食的仰仪、测定 24 节气的高表、候极仪、景符和窥几等十余件观察天像的仪器，以及玲球仪、灵台浑仪等表演天像的仪器。他在全国各地设立 27 个观测站，开展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工作，重新观测了 28 宿及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测定了黄赤交角，达到很高的精确度。在大都（今北京）修建一座观测天像的司天台。

黄道婆（公元约 1245—？年）。元代技术革新家。又名黄婆。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出身贫寒，幼年乘船流落到崖州（今海南崖县），渡过 30 年的岁月，学习黎族纺织经验。元贞二年（公元 1296 年）返乡。改进纺织工具，向乡人推广扎花车，弹棉椎弓，纺车和织机等先进生产工具，传授纺织技巧，促进棉纺织业的发展。谚云：“松郡棉布，衣被天下”。她死后，乡人建祠纪念，尊她为黄娘娘。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明代医学家。字东壁，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人。祖、父以医为业，青年时随父学医。他长期实践，一面行医采药，一面参阅历代医学著作800多种，对药物加以鉴别考证，纠正古代草木书籍中药名、品种、产地等某些错误。经过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铃医请教，历经30年，于万历元年（公元1578年），前后三易其稿，写成《本草纲目》共52卷，共收药物1892种，其中新补充的药物374种，对药物的名称、性能、功用、制法等都作了详细说明。书中还附有古代医方和民间验方11096条。该书不仅系统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医药学的丰富经验，而且把中国的医药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该书于1606年传入日本，先后译成日、朝、英、德、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公认为世界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著作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另有《五脏图论》、《淮客难》、《命门考》等，已佚。《明史》有传。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明代农学家。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32年（160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左春坊右赞善、礼部右侍郎等职。崇祯五年（1632年），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政事，后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因受阉党排斥不得志。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测量和农学研究。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学习交流科学技术，介绍西方的一些成就。晚年编著《农政全书》60卷，50多万字，是一部农学巨著，辑录了历代农业科学的重要资料，总结了农民的生产实践经验，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编译《几何原本》、《崇祯历书》，还有《徐文定公集》、《徐世庖言》、《毛诗六帖》等著作。《明史》有传。

宋应星（公元约1587—约1661年）。明代科学家。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万历举人。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南京亳州知州等职。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弃官返乡。博学多才，所著《天工开物》18篇，总结了明代以前手工业、农业生产经验，对农业技术、水力利用、化工原料、纺织、制盐、制瓷、金属冶炼、交通工具等生产过程，运用科学原理和数据说明。如草灰、铝丹、砒石如何应用于农业、手工业生产介绍颇详。有关采矿、冶炼的记述，是古代矿产知识的宝贵记录。《天工开物》早已译成日、法、德文。还著有《野议》、《论气》、《谈天》等。《画音归正》已佚。

徐宏祖（公元1586—1641年）。明代地理学家。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原名徐弘祖，在清乾隆时为讳忌“弘”，故改为宏祖。幼年好学，博览图经地志。因明末政治腐败，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专门从事旅行，作野外考察研究。在万历35年（公元1607年），从22岁起，历经34年，不避寒暑艰险，走遍北方燕晋、华南两广、西南云贵等16个省，对地质、地理、水文等实地考察，写成《徐霞客游记》20卷，将观察所得，按日记载。特别是对长江上游金沙江以及西南石灰岩地区地貌的考察和分类，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的学者。

徐寿（公元1818—1884年）。清末科学家。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先后在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格致书院任职。翻译《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求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西艺知新》、《汽机发轫》、《营阵揭要》以及《法律医学》等书。系统介绍了化学知识及西方在化学方面的成就。他发明制造了强水棉花火药、汞炸药诸法，与华衡芳造成本质

轮船“黄鹄”号。对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

华衡芳（公元1833—1902年）。清末数学家。字若汀。江苏金匱（今无锡）人。1861年曾与徐寿设计制造本质轮船“黄鹄”号。与英人傅兰雅合译《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合数术》（关于对数造表法）、《决疑数学》（关于概率论）、《金石识别》（关于矿物学）、《地学浅释》等书。在上海格致书院任教十余年，以后又在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与两湖书院、无锡求实学堂执教。著有《行素轩算学》六种，共23卷。

李善兰（公元1813—1884年）。清末数学家。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撰《则古昔斋算学》13种，共24卷，《考数根法》一卷。对尖锥求积术、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都有研究，其中的尖锥求积术已有初步的积分思想。他还得出一些有关二项定理系数的恒等式和判定素数的定理。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曲线说》三卷、《谈天》18卷、《植物学》、《重学》等。正确介绍了哥白尼学说。

詹天佑（公元1861—1919年）。铁路建筑家。字眷诚。安徽婺源（今江西）人。出生于广东南海。188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曾在水师和水师学堂任职。1888年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1905年任北京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1909年提前两年竣工，并以“人”字形铁道，解决了青龙桥上下坡的难题。随后担任川汉铁路总经理兼会办，广东商办铁路总经理兼会办，商办汉粤川铁路会办总工程师。1931年被选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1919年被任为协约国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

在现代。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地质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茅以昇（桥梁学家）、丁颖（农学家、水稻）、金善宝（家学家、小麦）、华罗庚（数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梁思成（建筑学家）、林巧稚（女，医学家，妇科）、钱学森（物理学家）、钱三强（物理学家）、钱伟长（物理学家）、周培原（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李政道（物理学家）、陈世骧（昆虫学家）、童第周（生物学家）、刘仙洲（机械工程学家）、戴芳澜（植物病理学家）、邓叔群（植物病理学家）、刘崇乐（昆虫学家）、李连捷（土壤学家）、傅鹰（化学家）、傅连璋（医学家）、梁希（森林学家）、钱崇澍（植物学家）、黄家驷（医学家）、涂长望（气象学家）、周建人（生物学家）、李继侗（生物学家）、李庆逵（土壤学家）、谈家桢（遗传学家）、汤佩松（植物生理学家）、胡先骕（生物学家）、熊毅（土壤学家）、黄瑞伦（农药学家）、熊大仕（家畜寄生虫学家）、俞大绂（植物病理学家）、任继周（生态学家）、马世骏（生态学家）、沈其益（植物病理学家）、陈景润（数学家）、钱信忠（医学家）、蔡邦华（昆虫学家）、候学煜（生态学家）、候光炯（土壤学家）、周明群（昆虫学家）、周尧（昆虫学家）、蔡旭（农学家）、王淦昌（物理学家）、袁隆平（农学家）、张乃凤（农业化学家）、程绍迥（兽医学家）、杨亚东（农学家、棉花）、陈桢（植物学家）、丁肇中（物理学家）、卢嘉锡（物理学家）、何康（农学家）等。

（本文于刊登于《癸未仲夏笔记》2003年）

一点建议

郭书田

2004年9月21日

由中宣部宣教局等单位编辑、学习出版社出版的《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介绍了当代知名的科学家，很受各界的欢迎，特别对青少年会产生很大影响。我立即买了两本分别给两个孙子阅读，并让他们做出学习笔记。

我在各地考察中，在大中小学校里，有的张贴了一些外国科学家的像，很少看到悬挂中国科学家的像。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对青少年实施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宣传当代的科学家外，还应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古代和近代科学家，出版这方面的书籍，印制画像，介绍他们的杰出贡献。在去年“非典”肆虐期间，我撰写了一篇《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名录》，收录了29位有突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事迹，写的比价粗糙。建议中宣部与科技部组织研究科技史的专家提出名单，用生动的文笔介绍他们的事迹，并在大中小学的图书馆或教室悬挂他们的画像。

刘云山批示：振民同志，阅酌，郭书田同志的建议要重视研究

1月27日

振民批：请宣教局商科技部教育部研究并提出意见。

1月27日

中宣部宣教局给刘振民同志的信

2005年2月5日

振民同志：

近日，我们按照您的意见，邀请科技部、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认真研究落实云山同志1月27日批示精神的具体措施，并初步拟定了方案，现报上。如无不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实施。

妥否，请批示。

振民同志批：拟同意，妥否请云山同志批示。

2月6日

刘云山同志批示：几条意见好，抓紧落实，要把情况告郭书同志，感谢他的支持。

2月6日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

从调研中看国农业现状与发展

许善达

会议开到这儿，大家情绪激昂啊。我先提一个小建议啊，我觉得现在的研究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到基层调研的报告比较少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就是这种调研报告比较少，这个说明我们的研究人员深入基层不够，所以很多报告都是靠数据，靠收集材料，这些都很有用，报告也很有价值，但是总的来看还应该在莫干山加强或者鼓励更多的人深入基层来搞这个调研，我们论文评奖专门可以设调研报告奖，要鼓励年轻人更多的要接地气，就提这么一个建议。

同时发布一点关于农业调研的情况。我们最近调研河北邢台市南和县有一个合作社，我们跟踪了五年，我们得出这么几个看法。

一、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有一点危机的萌芽。

危机萌芽表示在三个方面：1、现在土地流转的费用表示出两个特点：一个是对农民的收入来看比重一直在下降，差不多在 10%左右。对于一个家庭我有几亩地承包，这个收入只占 10%，所以他对土地耕作的积极性都在衰退。我就是再努力干，这块地也不能增加我很多收入了，还不如我打工，一个月挣好几千块。

另外一个表现是对于种地农民，不管是家庭种，还是种植大户，或者搞合作社，在生产者财务里面，地租占成本的份额还很重。

我们在南和县调查，出土地资源 and 出劳动力资源和出资金资源的，在净收入分配里面土地资源占到 70%，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对于农户来说收入比重下降，他不愿意投入，可是要真的让生产者去经营土地，这个流转费用占的成本比重又很大，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种植大户退租，我把地都还给你们，而拿到土地的很多农户弃耕（不种了），甚至有些农户连流转都不肯，就荒在那里。而且这个现象还在发展。

所以土地流转的费用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和在农业生产成本中的份额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生产的人负担又很重，而流转的人说这个钱对我来说又不是很重要，他又不愿意投入。这可能引发很多种植大户退租，一些农户弃耕的现象，现在在很多地方有所发展。

二、我们调研农业生产成本，包括土地资源的成本，使得我们的农产品生产的效率在国际市场上比，我们的效率低很多，美国、澳大利亚、巴西，这都是种植大豆、小麦、玉米，还有欧洲的养殖业猪、牛、牛奶等等，我们的生产成本要比这些都要高很大一个幅度。

比如说玉米，一斤玉米大概要差 2 毛多钱，一斤小麦要差 3 毛多钱，这种情况面临我们国家农业的开放，包括中美贸易战里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潜在的压力。我看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承诺里面，除了大豆等以前

进口的那些东西以外，包含的品种有小麦和玉米了，我们国家规定，小麦自给率 95%，玉米自给率 85%，对美国的这个承诺没有讲具体内容，是说我们有配额，是放在配额还是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们要放开配额或者扩大配额的话，那么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要进口国外的农产品，我们国内生产的压力就更大，我们分散户的农生产的农产品跟国外进口的在市场上竞争，那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随着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情况，现在还无法确认，就是三大主粮，水稻 95%自给率，小麦 95%，玉米 85%，这三个自给率能不能守得住。我们的开放，美国人压迫我们至少现在看小麦和玉米已经提出谈判的筹码了。从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发布的信息里已经把小麦和玉米纳入从美国采购的品种范围，这也是潜在的压力。

原来日本的农产品保护的很厉害，这次在美日谈判中间，它也大大的开放了。原来日本只买美国 100 多亿的农产品，这次增加了七八十亿的购买量。美国跟欧洲谈也有农业问题，美国跟中国谈也有农业问题，所以我们农业的生产效率，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农产品的开放程度在这几个主粮上再打开的话，给我们农业未来潜在的压力，现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那么清楚，但肯定压力是不小的。

三、现在我们中国经济下行，经济下行里面有我们自身经济的问题，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等，还有国际环境的压力。

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在中国生产，以美国为市场的企业外迁的趋势在发展外商投资主要投资在以中国为市场的项目，这个投资在增加。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而外资投资过来也都是科技水平比较高的。所以同样的投资规模，就业率（就业弹性）是下降的，这个会带来我们国家就业的压力，而就业压力里面首先是农民工就业的压力。

我们调查一些年龄大的农民工，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返乡的趋势了，城里体力活干不了了（因为年龄大了），返乡以后出现什么格局呢？原来一个农民到城里打工，家里的承包地只是解决家里几口人的生活费用，他自己的生活在城里解决，他还能拿一部分钱回去。现在他回乡以后，他自己的生活费用也要靠那几亩地，他也拿不回钱去。所以农村土地的压力会急剧的增长。现在 50 岁以上农民工返乡率已经很高了，城里的工作人家也不让他干了，他也干不动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对招工的影响现在在广东已经出现，你要想招找工作，你要会开机械，工资很高但招不到。体力活说我就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我有体力，工厂现在不招。

特别是建筑业，我们到碧桂园去看，建筑业开发的机器人替代那些重体力的工人。我们国家在几年之内用机器人科技含量替代人力的发展速度会很快。这个发展的结果首先是农民工回乡，所以这就给农村土地的压力增加很多。农民的收入，土地的压力，这些我们认为这也是农业潜在危机萌芽中的一项。

现在要说乐观的情况。我们现在农业生产规模化，我们调查发现家庭农场平均是 200 亩地，他的产量比农民全国平均种植的产量高出 60-70%，而合作社平均 1300 亩地，它的产量比全国平均数高 1 倍多。也就是说，如果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组织大户，而且更多要组织合作社的话，农业土地的潜力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怎么样把我们的政策推动这个合作社的发展，这是现在农村比较紧迫的一项政策。

现在看发展的速度，合作社的数量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为什么呢？因为办合作社财政有补贴，所以很多合作社是假合作社，咱们几个人凑一块成立合作社把补贴拿来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按照合作社来推动农业生产力，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推动先进生产力在规模化合作社结构下解决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提高1倍产量的话，那我们相当于增加多少亿亩耕地啊。

哪怕按20%算，现在是18亿亩耕地，20%计算还能增加2-3亿亩耕地土地当量，所以我们农业还是有潜力的，但是现在需要做新的工作，要让土地规模化。现在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就是我前面讲的，对土地的投资，对农业的投入是在衰减的，这是我们国家农业上要重点考虑一项政策。

同时现在还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现在和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先不说解放以前的事情，我们土改以后基层政权运转，它的资源是哪呢？是靠基层经济来支撑的。比如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里面的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你做管理性的劳动，他是靠工分，那工分分的是整个生产队。生产大队创造的财富。所以基层政权运作的资源是靠基层创造的财富中间切割出一块来。这些管理人员，咱们坦率的说，当年毛主席就强调这些管理人员要劳动，那个劳动指的是直接生产劳动，不是指得管理劳动，但是直接生产劳动是很辛苦的，管理劳动是比较轻松的，实际上这个格局一直那么延续。

到2006年废除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三提五统”是给村里党支部和村委委员会提供经费的，当时要不要废掉这个是有争论的。农业税是给基层政权，因为分税制给乡、村来使用。这两项废了以后，有一个文件规定，只有省政府才能发文跟农民要钱。这样的话，村党支部也好，村民委员会也好，这些人员工作也需要钱，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等于基层政权的运行已经不是靠农民收入来切一块支持运行，而是靠我们的财政拨款。

这个变化对于保护农民承包权益的效果是特别好，但是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现在还要振兴农村。我知道在河北地区一个党支部书记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兼了村长才有1800块钱，那对管一个村，又当村长，又当支部书记，一个月工资开1000多块钱，这个钱数是不多的。

那么将来基层政权靠什么来支撑它正常运行？特别是现在要农村振兴，振兴需要投入资源。可以肯定的说，现在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已经给农村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是很多资源投入，它的效果是值得很好来研究的。

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有农业机械补贴，良种补贴，这种补贴的名义都是生产性的，就是降低你的生产成本，但是在承包制制度下这些补贴给了承包户，承包户要流转的时候，这个补贴并不流转出去，事实上这个补贴名义上是生产性补贴，降低生产成本，事实上形成了是农民收入的补贴，现在农村基层运行，包括行政运行，还有振兴农业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做很多深入的调研。

我建议莫干山还要向1984年一样，要专门设立农业的项目，而且特别要鼓励一下到基层调研的项目。

（作者：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来源：爱思想网，2019年10月08日）

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

——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分析框架

李旭东

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视野。围绕着“过日子”“日常生活”等概念，学者们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展开多维且开放的思考。但相关研究展示的“日子”，似乎都特别“正常”，在大转型时代的巨浪下也能波澜不惊地过下去，延续“日子”的某种历史形态。然而，这种类似的日常生活研究结论显然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实际经验相悖，大转型社会中的人所过的日子及其从事的生产劳动，必然与以往生活的日常轨迹有所不同。尤其是对新行业、新领域中的人来说，他们要面对一种时代过渡性的生活与生产，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日常”？尤其是在我国追求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转型道路上，土地（及土地制度）、社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别样的图景，我们如何观察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之间的关系？

本文关注的经验对象是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群体（下文中简称为“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该群体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延续20多年。他们主要来自山东省、河南省等地区。在北京城市环形扩展过程中，菜农呈现出相应的从京内向京外迁移的态势，即从北京西南四环迁移到南六环附近，之后还有可能流动到其他地区。在这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流动过程中，菜农围绕着劳动、交换、家庭、人际和情感等方面展开了异样的实践。换言之，笔者研究的“他者”一直在流动，这些他者也一直置换自身的他者世界，同时也经历着“过渡日常”。他们既受到市场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双重影响，也要面对在流入异地生存之后的地方性知识情境；他们不仅参与中国经验的累积运动，而且在陌生社会的困境中经历着新的社会变迁体验。基于对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者提出“过渡日常”概念。所谓“过渡日常”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从家乡（户籍所在地）来到异地谋生，但其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本文试图结合有关菜农的具体田野材料来探讨“过渡日常”的分析框架，从而在整体上认识与把握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议题。

一、“过渡日常”的理论路径与经验观照

（一）“过渡日常”的两个面向：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

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观之后，舒茨将日常生活世界视为一个基础性的世界、主体间性的世界、文化世界和常识世界。列斐伏尔不仅肯定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批判视角。赫勒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有学者在借鉴舒茨的主体间性日常生活观的基础上指出，“日常生活世界是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前提，

是与历史相对的、发挥着奠基性作用的现实领域”。上述学者都强调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且把日常概化，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总体分析视野。但是如过度地概化而不区分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区别。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他们有时候会将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说成是一辈子的“过日子”；但在具体的日子里，何时劳动、休息以及娱乐，他们经常区分得泾渭分明。生产与生活的混融，以及从生活中摆脱出来生产，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实过程，更是不一样的分析视野。

有关日常生产的研究经典，当属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马克思构筑了一个总体呈现的生产与生活的分析体系，其中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人的生活、工具的使用与创新，以及人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等内容，重点在于揭示生产与生活的相互关系。他关注到了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劳动者利用自身能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消费着自身的能力和生产品。除“生产的消费”之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还用于市场交换，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在此过程中，就商品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而言，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和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有紧密关系。“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生产与生活的分析框架，既可以使二者区分，又可以使二者相连。这一框架并不排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尤其是在其价值理论之中，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将会使其更加复杂且充满张力。因此，我们应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方面共同作为“过渡日常”的整体面向。

笔者研究的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一种“近阈限”状态。“近阈限”是维克多·特纳提出的一个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分析概念，在这一阶段中，主体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无结构的状态，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抽离了出去，在一种“反结构”的状态下进行生活。就菜农而言，他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无身份、无地位”的“近阈限耕作”，这是他们在“过渡状态”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近阈限”阶段的时间期限是较为宽松与开放的，而非转瞬即逝的。它不只是包含时间要素，还指涉空间、身份、情感、生计方式以及劳动组织等要素。在代耕阶段中，菜农的年龄集中在35~60岁之间，该年龄段是个体生命中具有充分活力、承担家庭责任与履行家庭义务的时期。这一特殊阶段可称为菜农人生的“阈限期”。在这种“阈限期”中，菜农在生产与生活方面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状态。

就前者而言，他们在异地以一种外乡人的身份进行着一种代耕生产与临时生活，在逼仄的劳动空间中进行着“无季节性”的“无闲”劳作。此外，菜农群体与菜贩之间进行着“预支的”不对等的交换。菜农把蔬菜以“免押金”的方式提供给菜贩，等到菜贩在市场上出售完这些蔬菜后，菜农才可以从菜贩那里得到具体的资金收入。就后者来说，菜农的家庭形式表现为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的“异地化”，即子女在老家或其他地方上学或工作，而父母则在不同的外地工作。同时，菜农奔忙于劳动，其人际关系表现出一种“弱联系”状态，这种状态的产生是他们离开家乡——农村社会的结果，在具有临时性的共同地缘与业缘的新条件下又很难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但他们又极为关心家乡的生活，时刻操心子女的教育、婚姻与就业以及留在家乡的亲人，为子女的幸福和家庭的富裕在异乡奋力劳作。

总之，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他们的劳动、交换、家庭、人际和情感等方面。笔者以一种“近阈限”的过渡性视野分析现代工业社会中众多流动群体之一——代耕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关注他们在过渡状态中的生产力与生活力，展现该群体特有的文化实践与精神气质。在日常生产方面，该群体的劳动与生产、交换与消费、工资与利润，以及在特定场域空间的生产关系都有所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应强调该群体的衣食住行、习俗信仰、社会关系和情感意义等内容，关注他们的“实然

生活”，关注群体成员的价值观与人生意义。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赋予同等且分别的关注之后，既可以以为“总”的日常生活分析提供一种“分”的视野，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实现结合的可能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运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现代流动社会中更大范围的整体性结构。

（二）“消遣经济”与“过渡经济”——不一样的社会生活心态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过渡日常”中的生产与生活自然是一种过渡型经济，与费孝通先生所谓“消遣经济”迥然有别。如果说费先生的“消遣经济”概念解释的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老百姓的生活态度，那么“过渡经济”则是希望分析大转型时代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费先生在总结云南禄村农民传统经济态度之前，首先说明“经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相对性，指出它是相当于当时当地的人生态度，是一个反映人们生活心态的概念术语。费先生指出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观是一种“如何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打算”的经济观。韦伯曾分析了西方社会在新教伦理精神鼓舞下的“禁欲经济”，即“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阻止收入的消费使用，必然促使收入可作生产利用，亦即用来投资”。费先生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韦伯展开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非理性的和不以人为本的。而禄村恰恰存在一种不同于新教伦理指导下的以多劳动、多生产和少消费为荣的经济生活心态。“这种在节流方面的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态度。”“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闲暇满足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平衡。费先生认为，“消遣经济”是一种不以痛苦为代价获得快感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少劳作、少消费和有闲暇。其与“消费”的区别是，“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禄村人民的“消遣经济”的意义追求体现在公共活动和仪式方面，他们宁愿将自己绝大多数的收入消费在仪式、礼节和人情往来方面，而不是把资金用于再生产。

费先生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卷入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之中，而倾向于过日子的“消遣经济”概念很显然不能充分解释当下的经验现象。笔者关心的是菜农的“过渡经济”，其特点是多劳动、多生产、多交换、少消费、少闲暇和实践意义。与“消遣经济”不同，菜农视时间如金钱，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在菜棚里进行劳作，几乎没有节假日，既没有消遣的时间，也没有时间去消遣，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与生产的时间吞噬着闲暇的时间，菜农唯一闲暇的时间段便是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这是他们身心消闲的时刻。他们的意义追求并不在于参与公共生活和仪式活动，而在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表达和实现，即子女的幸福与家庭的富裕。与“禁欲经济”不同，菜农虽然积累着资金，但更多是为了子女幸福、家庭富裕以及光宗耀祖，而不是去荣耀上帝。他们的收入除了购置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外，更多用于实现人生价值与任务方面，如在家乡盖房、买房、买车，以及解决子女的上学、工作与婚姻问题等。总之，菜农的“过渡经济”心态是在“过渡日常”中形成的生产与生活心态，是一种调适具体处境与主观能动的社会生活心态。

二、“过渡日常”的方法维度与经验表达

（一）实践、策略与战术

实践、策略与战术等分析概念在当今人类学学科知识话语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面对劳动者群体的具体处境时，我们需要解释他们的实践行动，以及他们如何运用具体的策略与战术。人类学界为我们提供概念资源的前辈不胜枚举，比如布迪厄的“实践感”、塞托的“战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等。

布迪厄认为，“实践活动在它合乎情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是由直接适合场域内在倾向的习性产生的，

是一种时间化行为，在这行为中，行动者通过对往昔的实际调动，对以客观潜在状态属于现时的未来的预测，而超越了当下”。实践主体凭借充分地调动旧有的可用于当前场域的惯习来获得一种没有策略性的策略。惯习的生成是“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其因情景不同而发生转化，作为社会客观结构主观化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实践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行为和实际行动。相较于布迪厄的“温和的”实践观而言，塞托认为被统治者或弱者只有战术而无战略，战略（策略）是统治者或强者的专属。“策略即行动，该行动受益于某个能力场所（特有场所的属性）的假设而建立了一些理论场所（全面的体系和话语），这些理论场所能够将力量进行统筹安排的全部物质场所联系起来……战术即方法，它因自己赋予时间——环境，介入的确切时刻使环境变成有利的形势；迅速，运动的迅速改变了空间的组织；关系，‘计策’的连续时刻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时限和节奏可能的交错——的贴切而具有价值。”这种不占有专属空间的战术是运用时间来抵抗战略的。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发展了塞托的“弱者的战术”。作为一种“隐藏的文本”，弱者的武器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在强者的空间中进行着弱者的实践。这种实践的背后有一套象征意义体系作为支撑点。“生产不只是、而且也决不是物质效用的实践逻辑。它是文化意图。”实践的文化意图引导着实践者的具体行为。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体现了实践、策略与战术的综合运用。因此，我们需要看到菜农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不同场景中的具体实践行为，需要把握在“生产-交换”这一具有时空性的关系链条中菜农所采取的策略与战术，以及需要理解菜农的实践行为背后的象征法则和意义图景。

菜农在具体的劳动场景和生活情景中会采取不同的实践行为，运用不同的策略与战术。对于菜农来说，最频繁和最日常的事情便是劳动生产与市场交换。每户菜农一般租种4~6亩土地，利用简易的生产工具，通过夫妻共同劳作的方式，去种植与收割油菜和油麦菜。菜农每天劳动13~18个小时，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菜棚里度过的。从选择菜籽到装筐的整个过程，菜农都施展着自己的策略与战术，而不是像塞托所言的弱者只有战术没有策略。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市场需求选取不同菜籽，夏季时他们会用夏菜籽，春、秋和冬三季则用冬菜籽。他们把大棚土地分为不同的小块以便更好地经营与管理蔬菜。他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调整浇灌蔬菜的频率。在割菜和装筐过程中，菜农会处理好割菜时间与接筐数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计划接多少个筐，从什么时候开始割菜，可以保证到天黑之前割完。他们边割菜边装筐，为了使菜在装筐时不受损，把蔬菜的菜头向外、菜叶向内摆置。

当与菜贩进行交易时，菜农便会使用塞托意义上的战术。在报菜价时，菜贩会先让菜农给出一个价，如果菜农的出价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菜贩则按菜农给出的菜价进行交易；如果菜农出价高于市场价格，菜贩则会和菜农商量价，最后双方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达成交易。这是一种存在时间差与空间距离的不对等交换。菜贩占据着市场交换的优势地位，在自己专有的交换空间中实施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菜农则会运用塑造“良好形象”的自我呈现方法来与菜贩进行博弈，同时运用战术来呈片状地渗入菜贩所专有的交换空间中，“这一战术无法整体地把握这个空间，也无法远离此空间”。

在“无闲的”劳动与“预支的”交换过程中，菜农的身体与心灵经历着不同的体验。生产的辛苦与劳累，交换的担心与喜悦，“行动的现实过程，总是包含身与心的互动”。这种身心互动不止于日常生产，也涉及日常生活。菜农在狭小而简易的居住空间中进行着饮食起居，早餐与午餐一般是从村里饭店购买食物后在菜棚里就食，晚餐则是在租房中自己做饭。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以电风扇来散热与消暑；在寒冷的冬日里，他们以电热毯来抗寒与保温。菜农的身心体验交织着多种色彩，这体现在他们具体而多样的实践行为中。

（二）时间、空间与时空感

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共同形塑了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形式，因情景不同和习性各异，个体的身心对时空的感受亦不同。这种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徘徊在具体时间与空间的内外。埃文思-普里查德根据非洲努尔人社会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两种关系将时间分为“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这一分类已涉及两种基本关系。张柠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境况，提出一种较新的时间分类方法，即生态时间、结构时间、节日时间、机械时间和心理时间。这一时间类型的细分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地认识多维时间。此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二十四节气、农历与公历等时间分类。这些不同的时间类型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菜农在生产与生活中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呈现为一种多层次复合式图景。在他们日常交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时间的多种表达，如“我们一般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了，一直干到天黑得啥都看不到为止。睡觉的时候都到11点多了”。“有些菜贩是头一天晚上下筐，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来拉菜，等到下次下筐时结上一次的账；有些菜贩是上午10点左右下筐，晚上8点左右来收菜，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再下筐并与菜农结前一天的账。”“冷棚里的油菜从农历十月就开始长得慢下来了。”“节气不同，菜的生长速度也不一样。”“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回家，有些人会回去，但也待不了几天就过来了，一般会待到正月初五。”“我们平时交流得很少，一般都在拉菜的时候交流、聊天。”

平日里的言语内容涵括了多种时间表述：一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呈现的白天与黑夜等自然时间；二是体现在钟表上的机械工业时间；三是菜农根据起床与完工、下筐与结账等具体标志行为来体察的时间；四是菜农和菜贩的交流以及菜农彼此之间的交流体验着的“结构时间”；五是菜农根据二十四节气、农历等生态时间概念描述蔬菜的不同生长阶段；六是与春节等节假日相关的节日时间。这些时间中都含有菜农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含有一种心理时间的表达。总之，菜农经历着多重时间体验，既有机械性的工业时间、自然性的生态时间，又有关系性的结构时间、反实践的节日时间，同时还有身心体验的心理时间。

与时间相伴的空间亦呈现出多样性。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作一种可被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具有生成性的事物，进而将空间分为三个层面：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他以城市空间为例说明在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如何践行社会活动和表达情感体验。福柯在对“规训与惩罚”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将空间视为权力得以实施的场所，并指出空间具有区分社区生活形式的功能与意义。而塞托将空间视为一种被实践了的场所，使得空间中充满了权力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较量。

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并置型棚户和租本地人房屋的租赁型住房等居住类型都影响着菜农具体的实践行为。他们较为零散地居住在村内或村外，居住条件较为简陋，房内布置较为简单。他们早出晚归，往来于菜棚和住所之间，在菜棚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剩余少许时间在居所中度过。菜农的休息居住空间、劳作生产空间、市场交换空间是三个不同的空间地点。连接三个空间的纽带是活生生的劳动者本人，他们通过使用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在三个空间地点中来回穿梭。菜农之间既彼此交流，又与菜贩交易，偶尔还与本地人交谈，这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三种空间场所的分布。由此，菜农产生了围绕大棚、房屋、道路、货车以及社会关系等具体的空间感。总之，菜农的时空感是在具体的劳动场景和实践图景中形成的，是在能动性与合作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在具体时间和空间中的一种个体性感受。

（三）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

在“抽象社会”的“无相支配”情境中，众多底层劳动者以各自的象征意义体系作为支撑点进行实践。菜农在异地劳动主要是以子女和整个家庭为意义中心的。对他们而言，“过日子”不仅是指涉自己的生产与

生活，而且还涉及孩子的成长、成家与立业，以及光宗耀祖与庇荫子孙。“人正是在‘过日子’过程中创造了现实生活并实现人生意义。”为了子女幸福和家庭富裕，菜农进行着劳动生产和实现着人生意义，并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义的实现过程中。在个体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中，他们实现着一种情感的反身性自觉。

对于菜农来说，子女的教育、工作和婚嫁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努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利于子女将来的求职。此外，对他们来说，子女结婚就是新家庭的建立，也是传宗接代的开始，更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相较于子女而言，“家”在菜农生活中占据着另一重要位置。比如何大娘认为，“儿子没结婚时，父母在哪，哪就是家；儿子结婚后，儿子在哪，哪就是家”。家的重心随着家庭中子女的成家立业或立业成家而发生位移。父母逐渐由全权负责过渡到边缘负责，最后到依靠子女；与此同时，子女的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地增加。在王叔的观念里，小家庭和大家庭都很重要，他既看重小家庭中的代际传承和子女的生活，又看重大家庭中的孝敬老人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家不只是包含现在活着的人，还包括已去世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子孙；不只是一种物理建筑空间，还是一种集姓氏、情感、意义、声誉、名望等于一身的复杂组织。除了家的人生观意义外，家还有一个物质面向——房子。菜农非常重视房子，在家乡盖新房既是财力的象征，也是声誉的象征，更是文化意义的回归。

总之，“在一种文化形式中，人的内心情感体验落实到具体行为上，而作为行为的主体，活生生的人生存于丰厚的日常经验当中，因此，这种文化形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心态构成了直接的关系”。当我们想了解特定的个体或群体的情感体验时，我们便要把该个体或群体所属的文化形式、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心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描述、分析与解释。而意义表达则付诸于情感体验和具体行为的基础上，围绕着子女、家庭以及祖先与后代而得到展示与呈现。

三、制度结构、过渡日常与现实经验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理解流动社会中“过渡日常”的总体分析框架，其既涉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又观照“过渡经济”。日常生产指涉劳动与交换、资本与利润、生产与消费等内容，日常生活涉及衣食住行、习俗信仰、情感体验以及社会关系等内容；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综合研究“过渡日常”，探讨菜农在生产与生活的不同场景中的具体行动及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文化法则和意义图景；同时，也关注“过渡日常”中劳动者的社会生活心态——“过渡经济”，其是一种践行多劳动、多生产、多交换、少消费、少闲暇和实践意义的心态。该分析框架的具体经验表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实践、策略与战术，时间、空间与时空感，以及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劳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中运用多样的实践、策略与战术，感受多重的时间、空间与时空感，以及呈现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这些内容的展开都离不开劳动者自身的身心互动，以及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京郊代耕菜农的“过渡日常”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不一样的“过日子”图景，以往的学者们较多地强调老百姓“过日子”的总体性视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淡化了“分”的视野。因此，我们可以结合“总”与“分”两种视野来看待老百姓如何“过日子”，运用一种“总—分—总”的阶段分析法研究“过日子”的文化奥秘，其中“分”的阶段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分别进行考察。这一分析法可以进一步挖掘“过日子”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代耕阶段中，菜农形成了自己的日常状态，这种状态既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小农，又有别于如今的本地村民。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与菜贩等人群之间的交换来建构一种“有秩序而无形态”的社区，同时，这种社区受到更为开放的国家制度、市场经济和地方权力的形塑。正

是在这种不确定的和临时性的情境中，菜农的行为与感受才愈显不同寻常。他们基于“儿女、家庭及其所赋予的意义”这一主线在具体环境中进行实践活动。这一象征图式是菜农“过日子”的文化理性。在文化理性背后，便是实践行为的具体表现。他们在平日里的无闲劳动、对菜籽的精心挑选、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对大棚空间的充分扩展、对雨雪天的格外关注、对市场菜价消息的“灵通”、对专有空间和时间的充分把握、对菜筐里蔬菜的精心布置、与菜贩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及他们在逼仄而简单的且没有取暖设备的租屋内居住、在菜棚里吃着“速餐”等，都是他们在生产、交换和生活方面的实践行为的表达。他们的实践表达含有一种总体性倾向，即他们把布迪厄的实践策略、列斐伏尔的战略、塞托的战术和戈夫曼的自我呈现方式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且将四者共同用于实际的生产与生活中。在这种较为“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感受着和体会着日月星辰的变化、工业魔力的作用、心理状态的起伏以及弥散权力的缠绕，这些要素共同影响着菜农的身心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菜农关注“我是谁”这一涉及身份、归属与情感的问题。

与京郊代耕菜农的境遇相类似，中国社会中许多底层劳动者都经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张力的形塑。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出来，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日益显著，与此同时，在人地关系不协调的影响下，许多农村的青壮年群体为了生计而开始离开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他们或进工厂打工或在农田上种植。这便是“农民工”和“代耕农”等流动群体产生的“势”。这既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受特殊的国家政策、市场资本和地方文化等多重作用力的影响，众多的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流动性呈现为一种“过渡状态”，他们经历着“过渡日常”，在劳动生产、市场交换、饮食起居、人际关系和情感体验等方面均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他们在特定的具体的时空条件下采取多种实践、策略与战术进行生产，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过渡经济”心态使得劳动者更多地参与生产与劳动，而较少进行消费与休闲，进而实现意义。同时，这种过渡状态也生成了不同群体进行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因素，不论是原先社区中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戚与老乡，还是当下因新地缘和业缘而产生弱联系的新共同体，这些都是新的社会结合产生的可能条件。但是，劳动者的“过渡心态”和弱信任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新的社会结合得以维持的念头。新的社会结合能否产生与持续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制度和市场资本，它们既共同助长了流动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又进一步形塑着该群体的“过渡日常”，然而，它们也是流动群体及其“过渡日常”泯灭的主导者。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中国底层劳动者的能动性 and “想象力”，他们对生产与日常生活有一套更为有效的运作逻辑，可以让“日子”过得更好。

在“过渡日常”中，劳动者在特定时空场域中进行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这种生产与生活“在广义上便表现为成就人自身与成就世界的过程”。劳动者通过具体实践行动既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以及价值意义，为家庭贡献力量，为结构重新注入活力，又为处于全球化、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提供能量。因此，我们应该把处于过渡状态的劳动者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背景下产生的且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和现象。而我们亟需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结构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如何探求更本质的平等问题，以及如何在更大层面来构筑嵌入式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又要求我们实现跨学科合作研究。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本文于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乡村产业振兴的“白马样本”

刘 力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主动作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走出了科技兴农、产业富民的发展之路，初步形成了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白马样本”。

白马园区的建设历程

白马镇作为溧水区传统的经济薄弱镇，经过多年磨砺，实现了从“以镇带园”到“园镇一体、以园为主”的转变。主导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2018年白马镇地区生产总值38亿元，十年增长了近4倍，农民人均收入24701元，增长了近3倍，实现了经济薄弱镇到全国“千强镇”的历史性跨越。回顾白马园区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产业初兴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2009年）

该时期“两莓”产业初见雏形，鲜食黑莓以出口为主，增收效果明显。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引进黑莓、蓝莓，经过考察选择在白马镇石头寨村试验示范，在白马播下了产业振兴的种子。由于黑莓生产成本低、经济效益好，加之当时国际市场黑莓产品旺销，受到白马农民群众普遍欢迎，成为当地首推的“短平快”富民项目。黑莓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2007年达到4.3万亩，亩收益达0.5万元，农民尝到了科技创新的甜头。“白马黑莓”畅销海内外，成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知名招牌产业。2009年，白马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478元，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

2、园区初创阶段(2009年至2014年)

这一阶段园区各类创新平台、农业企业相继落户，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两莓”产业稳步发展，一二产联合发展的“白马模式”初见端倪。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等7家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入驻园区，加速了农业科技资源的集聚，为成功创建“江苏南京白马农业科技园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培育形成了泽朗生物科技、金万辰、黄教授等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形成了以黑莓、蓝莓、茶叶、有机产品为主导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园区企业及时吸收大量当地农民就地就业，2014年全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221元，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3、园区成长阶段(2014年以后)

产业业态向高端化、融合化发展，园区形态向特色小镇、美丽乡村转变。深能新能源等企业总部陆续入

驻，国家作物表型组学等重大科技项目纷纷落地，光伏产业、农业智能装备、生物育种等朝阳产业在园区蓄势待发。园区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涌现出一大批乡村创业明星，科技服务业、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等新型业态在此不断积聚。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成功创建李巷、王家边、杨家边等22个美丽乡村，加快了农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从产业振兴、创新创业、综合改革成果中得到实惠，白马农民正大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白马园区的发展经验

白马园区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依靠科技引领、产业兴农，发展现代农业大有前途，经济薄弱镇同样可以实现经济腾飞、乡村振兴。总结白马十年来成功经验，主要得益于五个方面。

1、得益于园区坚持科技引领、绿色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白马园区始终围绕“打造国内一流农业科技硅谷”建设目标，没有为了追求短期出效益，出政绩，以牺牲环境为代引进化工、采矿、造纸等污染企业，而是坚持科技引领、绿色发展，走“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推进园区开放合作共建，引进农业创新平台、构建农技推广体系、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形成了全国知名的“白马园区发展模式”，为白马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2、得益于园区坚持协同创新、集聚发展

园区加大鼓励科技创新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快要素集聚和科技创新，打造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强磁场”。目前，已集聚国家及省市科研平台80余个、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200余名，参与园区建设的人才达1000多名，累计承担农业科技项目35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580多件。技术创新合作也从国内走向国际，先后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农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国际知名学院开展深度科技合作交流。同时，园区构建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与7大入园院所共同成立“白马园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与龙头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以“两莓”产业为主攻方向，合作研发农业新品、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每年企业与院校签订的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项目20个以上。

3、得益于园区坚持跨界融合、转型发展

园区适应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推动“两莓”现代农业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未来新兴产业迈进，重点培育生物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智能装备制造以及农业科技服务业等产业集群。着力引进重大科技项目、先进科技成果落户园区催生新兴产业，与中科院合作建设的江苏最大“光伏+农业”智能植物工厂顺利投产，“两莓”高分子萃取产品生产线即将投产。引入社会资本，采用PPP模式建设农科小镇，推进“一平台四中心”（农业科教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成果交易中心、技术培训中心、新技术新品种展览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会展经济、总部经济等新型业态。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科普等产业深度融合，突出“红色土地、蓝色经济”主题，依托红色李巷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农业、田园养老等产业。

4、得益于园区坚持广纳贤才、开放发展

园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项目，专门出台支持园区建设发展相关政策，为人才提供专家公寓、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配套保障，为入驻企业和引进人才搭建起全功能、全方位的发展平台，积极营造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创新创业氛围。园区星创天地组建了科技创业服务团队，聘请创业导师、技术导师，整合科技、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打造融科技示范、成果转化、融资孵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为各类创业主体搭建平台，提供工商注册、项目审批、用地协调、成果交易、政策服务等全程优质服务。目前星创天地已入驻涉农企业 120 多家，其中专家教授等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 28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及创客 98 名（家），涌现出南农大教授黄明、中科院博士后田琨、德国青年马克斯等创业明星。

5、得益于园区坚持产业富民、共享发展

园区大力推进产业富民、创业富民、改革富民，鼓励农户通过“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推进“两莓”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融入农业供应链体系。据统计，“两莓”产业每年为当地农民户均增收 1.6 万元。园区实施新市镇核心区扩容工程，打造商业服务、人才公寓、物流集散等配套服务片区，着力改善文教、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成三家省级优质幼儿园，改善小学、中学教学设施，成功创建全国绿色中学和国家级示范小学；与溧水区人民医院共建医疗联合体，所有村卫生室由镇代管，实现百姓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不断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有自然村完成垃圾分类处理，32 个自然村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厕所 530 个，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白马园区振兴的启示

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时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新要求，白马园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园区建设为载体，正形成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白马样本”，对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推动全市乡村产业振兴，具有启示借鉴作用。

1、以“科技+农业”引领都市农业发展，是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向

白马园区的成功，关键在于突出了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农业高科技企业的培育发展。园区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抢占了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通过农业科技资源集聚，加快了农业科技服务业的兴起。园区当前已成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正在建设的农业会展中心等平台载体，未来势必进一步凸显白马“农业硅谷”在全市、全省、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辐射影响力，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集聚发展。科技创新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引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加强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既是优势也是大势。要借助现代农业园区科技先发优势，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成长潜力大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群，形成一批带动性强、特色鲜明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要把农业科技服务业作为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全新方向，加强农业领域科学研究、专业技术服务、科技培训和信息交流、技术推广以及知识产权市场服务等，促进科技与农业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增加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加快乡村产业振兴。

2、以“院所+园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通道

白马园区通过“园镇合一、以园带镇”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南农大、南林大、省农科院等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的集聚发展，也为白马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其中仅南农大就规划投入15亿元，目前已经投入约5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白马加快城镇集约化建设，聚力打造农科特色小镇和22个省市级以上美丽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面貌焕然一新。南京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应充分借鉴白马经验。一是优化全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布局，努力实现市级以上农业示范园区涉农镇街全覆盖。二是创新园区土地、税收、金融等激励政策，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自主开发利用，鼓励在宁涉农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国有资本等下乡与农业园区结对共建，按照“一园区一主导产业”模式，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积极整合园区基础设施、土地综合整治、农业综合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各种项目资源，推动农业科技园区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协同部署、协同推进、协同发展，共同走出一条具有南京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

3、以“人才+创业”增添乡村发展动能，是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活力源泉

白马充分利用园区的创业机会，用足用好人才政策，打造人才集聚新磁场、强磁场，目前吸引了各类高层次人才200多名，参与园区建设和创新创业大学生1000多人。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各类人才的支撑，各级政府应充分借助现代农业园区这个有效载体，落实创新创业政策，积极引导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积极选派一批有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的机关、院校科技干部到园区挂职，提高园区科技管理能力和水平；积极搭建园区院士工作站、教授博士柔性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引导高层次人才智力向园区集聚，将智创、文创、农创不断引入乡村，促进资源要素活力竞相迸发和创新创业源泉充分涌流。

4、以“企业+农户”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保障

实现现代农业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健全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白马园区不仅利用“园区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的现代生产组织模式，有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升，而且还将科研院所培育的新品种，优先供应给当地农民，进一步密切了与农民的关系。同时，农民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品种，为园区企业带来了更多收益和发展空间，实现了企业与农民“双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主体在农民，根本在产业。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必须要与农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要通过“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建立起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机制。要积极鼓励引导更多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设备装备、政府补贴等，通过折价入股的方式，参与园区创新创业，让小农户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同步提升、同步进步，全面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为推动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保障。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研究室）

昆山农村飞速发展面对面

——概述昆山农村 70 年大变化

张树成

正值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就亲历亲见亲闻昆山农村 70 年栉风沐雨、70 年筚路蓝缕、70 年砥砺前行、70 年沧桑巨变的史实，经初步梳理，从六个方面概述如下。

一、土地制度大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昆山土地制度变迁大体经历了“两分两合”的四个阶段，实现邓小平关于农业土地经营的两个飞跃。即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制。当时占全县 80% 以上的无地或少地农户分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农业合作化后，农民从土改分得的土地以各种形式合归集体经营；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按农户人口、劳力多寡又将土地分包到农户；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摆脱“大国小农”的羁绊，农户将承包所得的土地以流转方式纷纷让给种田大户或家庭农场、集体农场实行适度规模农业经营。在这“两分两合”土地制变迁中，对维系农民生计的承包土地财产权益保持长期不变，以足够的历史耐心让农民放心。正因为如此，从根本上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通过大兴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推广先进农技农艺，实行良种良法耕耘，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不断发展。以水稻生产而言，昆山 1949 年亩产仅有 292 斤，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就跃上 500 多斤台阶，60 年代上升到 700 多斤，70 年代亩产超“纲要”达 800 多斤，80 年代 900 多斤，90 年代超 1000 斤。进入新世纪，农业生产全面实行操作机械化、管理现代化，水稻亩产稳定在 1200 斤左右，夏秋两季粮食亩产超“双纲”，即 1600 斤以上，2018 年高达 1861 斤，其中水稻亩产 1246 斤，小麦亩产 615 斤。

二、产业结构大调整

昆山历来素称“江南鱼米之乡”，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历史上粮油生产和出售商品粮最高的年份是 1984 年，共产粮 10-19 亿斤、产油菜籽 4750 万斤，出售给国家的商品粮 5.4 亿斤、油菜籽 3800 万斤，商品率分别为 53% 和 80%，曾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粮食生产先进县的殊荣。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发展了社队工业和经商等第三产业，呈现一派勃勃生机的繁荣景象。昆山市矢志不移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历经三次大的飞跃：上世纪 80 年代实现“农转工”（由以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第一次飞跃；90 年代实现“内转外”（由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第二次飞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卓有成效地推进“低转高”（产业由低端向高

端发力）、“大转强”（产业由做大向做强发力）的第三次飞跃。就这样，尽管全市耕地逐年减少，由于农业结构调优调高，农业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据资料反映，201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5.09亿元上升为56.87亿元，增长11.2倍；农业增加值由1979年的1.3亿元上升为31.62亿元，增长2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252元上升为41664元，增长16.5倍。更令人信服的是昆山经过艰苦奋斗，始终保持经济稳定上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832.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7.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16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40.6%、98.8%和68.9%。早在2005年率先实现江苏省制定的全面小康社会指标要求，2012年成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从2005年起至2019年全市经济综合实力连续15年居全国县级市榜首，现已成为江苏省首批6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试点地区之一。

三、社会保障大改善

昆山市一以贯之为百姓求发展、谋幸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建立与完善以低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为主的农村三大保障体系，筑起了挡风遮雨之墙，解除农民后顾之忧。如今，全市农村低保全覆盖和居家养老全覆盖。早在1997年1月与12月城镇、农村就起步施行低保政策（当时城区每月每人170元，镇区每人153元、农村每人100元）。从2007年1月起，按照人均生活费用每天不低于1美元的国际标准给予补足。2008年又把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天2美元，尔后逐年增加。2019年7月1日起由之前的每人每月低保标准945元提高到995元，平均每天合4.8美元，为全省最高，享受此标准共1450人（城镇778人、农村672人）。另外，各区镇富民合作社对每个低保户送2万元干股，低保边缘户送1万元干股，年终可分别获得1600元、800元红利。全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全面并轨。从2002年试点、2003年起全面推行，当时有10万多老年农民（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无门槛进入农保，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100元至130元，到2009年提高到250元至280元，女性享受老保年龄由之前的55周岁降为50周岁。1996年起农保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轨。2018年全市城乡参加养老保险的133.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99%（扣除昆山常住户口在外地参保人数），其中因种种原因农保对象尚未转入社保的有30283人，其领取保金最低水平每人每月540元，高的690元；享受社保待遇的昆山籍居民最低的每月可领取老保费810元，一般的在3000元左右，最高的是央企、国企原职工，因缴费标准高、工龄长，一般在4000元至5000多元。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从2004年起，由村合作医疗向基本医疗保险过渡，2007年城乡并轨，城乡居民一样刷卡看病，参保率达99%以上。2018年标准为1070元。同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平均报销医疗费可达54%以上。通过织就三大保障网，且越织越厚实，实现了农民期盼的“老有所养、贫有所济、弱有所扶、病有所医”的愿望，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大大减少，并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四、基础设施大变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昆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基础设施快速推进。昆山农民

亲身感受最深的是农田水利、路桥交通、供电通信等三大基础设施大改善、大变样，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2018年城镇化率达72.78%。就农田水利建设而言，新中国成立后，昆山人民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马不停蹄打了六个回合的硬仗：上世纪50年代以防洪治涝、建设圩区为重点，狠抓修圩复堤工程建设。60年代以连圩并圩，增强灌排能力为中心，发展机电排灌事业。70年代以建设稳产高产、旱涝保收基本农田为内容，实施大面积平整土地，格田成方，路渠成网，推行“四分开两控制”治水改土措施。80年代以提高农机设备效率、加强经营管理为抓手，发展水利经济，增加社会效益。90年代以围绕“农业保丰收、城镇保安全”为目标，全面提高防洪抗灾能力，确保城乡安度汛期。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进一步确立水利是国民经济命脉、改善人民环境的基础地位，以“两个率先”为目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水利设施，大力推行落实河长责任制，建设靓丽的水环境风景线，不仅改善了水利面貌，而且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夯实了基础。在根治水害的同时，有效地改造了30多万亩低洼穷土，治愈了28万名血吸虫病患者。抓好路桥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复一年，舍得投资，不断加强路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克服河流多、桥梁多等各种困难，兴建城乡公路和城际轨道交通，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化的大交通网络体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求。其公路密集程度每平方公里区域达1.8公里，为全国县级市之最。据2018年资料显示，全市拥有公路总里程1585.37公里，其中乡道395.2公里、村道754.8公里、高速公路互通出口有11个；铁路（昆山境内）92.49公里，航道383.8公里，2013年竣工投入运行的跨境轨道交通11线6公里，2015年建成市区中环高架公路44.2公里，2018年轨道S1线开建，境内里程37.3公里，前10年就实现村村通公交。发展供电、通信事业、电力事业，1949年仅有1家85千瓦柴油发动机的光明电厂，年发电量只有40万千瓦时。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大投入建设力度，取得长足发展。到2018年，全市电网已拥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91座，其中35千伏15座、110至220千伏72座、500千伏3座、1000千伏1座，主变容量3262万千伏安；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261条、1875公里，10千伏至20千伏配电线路1205条、8702公里；供电量253.47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长352倍，工业用电每度创造的产值由1978年的3.93元上升2018年的46.3元，增长11.7倍。通信、电讯事业发展瞬息万变，许多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呈现大跨度多领域快速发展，网购已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全市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手机248台和电脑81台，互联网零售额达370.44亿元。

五、村庄面貌大改观

回望昆山遍布广袤田野村庄的最大变化，莫属众多分散的零星自然村，通过调整合并，强村带弱村，新村变社区。村庄农房翻建由市镇统一规划，代代有新花样。上世纪50年代破旧小屋翻建成宽敞明亮的新农房，60年代草房大多翻成“三间一转头”瓦房，70年代平房翻建成层高二、三层的楼房，80年代继农业合作化后第二轮新农村建设，重新规划布局，不少村庄与农房纷纷异地翻建成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农村。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先后提出两个“20字方针”的新农村建设新的目标要求，昆山坚持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路，开口子鼓励农民自费翻建农房。与此同，镇村统筹设计，在农村建设路

网、管道、绿化、排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市镇村三级投资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含医疗卫生室、会议室）、文体中心、幼儿园、商业摊店等公共配套设施，更是按照“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大力修复生态环境，扎实推进村庄整治，实行美化、绿化、亮化工程，有序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垃圾分类处理，破除陈规陋俗，切实扭转农村长期存在的不良卫生习惯，再现粉墙黛瓦、环境整洁的江南水乡新景象。凡此种种，不仅使农村既塑形又铸魂，有品味、有特色、有底蕴，而且在城乡发展规划布局、资源管理、产业发展、就业保障、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冲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湮灭城乡“鸿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切实兑现了广大农民期盼“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昆山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依托农村农业资源，融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狠抓农村产业发展，在建设千亩水稻、千亩果园以及水产、花卉、苗木产业基地，发展生态有机农业、高效规模农业和订单农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等新兴产业，由此涌现了周庄镇祁浜村、锦溪镇祝甸村、淀山湖镇六如墩村、千灯镇歇马桥村、张浦镇尚明甸村和姜巷村、花桥天福庵湿地公园等一批具有江南水乡古村落、圩田湿地风光、乡野硅谷独特气质的乡村旅游先进典型，带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六、农民收入大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昆山历任领导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少取多予的方针，不遗余力地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城市基础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生活要素向农村辐射、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竭力为农民发声，谋农民利益，扶农民致富，让农民共同过着富裕、幸福、安康的现代化生活。如今，昆山农民不只是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于2006年起免交千年遗留下来的“皇粮”国税，而且种田还享受着购买农机具、良种、化肥、农药等农业生活资料的优惠补贴。如此，通过构建农民社会保障系统、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文化设施，义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广泛拓展农民就业渠道等综合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心病。突出的是从1996年起，先后在农村实施调改工程、富民工程、“三有”工程（认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基石”工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富民强村工程，以及近年来采取的局村挂钩帮扶、企村对口支援和委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等措施，使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面貌不断改善。据资料反映，201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1664元；分别比1957年108.1元、1978年201.3元、2012年23186元增长383倍、206倍和79.4%。由于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增收幅度连续数年超过城镇居民增幅，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1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53:1，大大小于江苏、全国的收入差距；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为27.3和28.7，基尼系数城乡大体相同为0.3；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8.16岁提高到2018年的83岁。

（作者：昆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农村经济研究会、老区开发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顾问）

村庄与长城

郭于华

宏伟长城/平常百姓

万里长城，无论作为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伟大的“建筑典范”，还是作为“中华文明的见证”，抑或“民族精神的象征”，从来都是与民族、国家、政权紧密联系的，也因此而被赞美传颂感叹折服了千年之久。正如长城学家罗哲文所描述：“起春秋、历秦汉、及辽金、迄元明，上下两千多年。有多少将帅元戎、戍卒吏丞、百工黔首，费尽移山心力，修筑此伟大工程。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为中华留下丰碑国宝。”

而长城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与平民百姓的关系却常常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除了孟姜女寻找夫君范喜良哭倒长城的神话传说在民间流传，彰显的是举国之力伟业之下的万千枯骨。

纵有绵延万里，纵是斗转星移，生存有着它亘古不变的逻辑。长城脚下的村庄，以各种方式与长城关联着：或许祖辈人参与过长城的建造？或许村庄本就是屯兵守关的营盘？抑或靠着长城谋取生计。有民谣传唱：“天之下，地之上，长城脚下是故乡”，长城与天地山川一起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气质。故而不难理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长城吃长城，本就是生存常态。

位于怀来县石灰岭的长城属于京西燕长城段落。据传燕昭王于公元前 295 年在造阳（今怀来大古城）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县）修筑长城，以防御山戎部落侵袭，属于该地区修建最早的长城。至明代，进入长城修筑史上的鼎盛时期：历朝历代，明长城可谓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建筑也最为精美。是中国万里长城的建筑典范。怀来县境内的样边城（庙港长城）就是这一时段的代表作，被称为建筑质量、规格最高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其位于庙港东、横岭西，总长约 3000 米，城墙都是用规则的大石条砌成，成为明代长城名副其实的样板工程。

这段长城脚下的数个村庄，建筑材料多来自于长城：房屋的地基、墙壁、院落、台阶等多是城墙砖石，构成家户和村庄的生活空间与独特风貌。实可谓：万里长城今犹在，已成寻常百姓家。村庄形成的历史难以追溯，恐怕少说也有三、四百年，可以想象的繁荣抑或贫困如今都已没入荒草尘埃。

农民尚未终结/乡村已然凋弊

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农村与农民的命运无可回避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是几乎必然的生存选择，安于土里刨食只能解决温饱却不可能致富。然而农民进城工作却被一些学者视为今日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教育、治安等问题以及村庄空巢化甚至涣散凋零，似乎都直接和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有关。

长城脚下的坊口村，据村书记所言，村里已经没有五十岁以下的人了。一些老人守着祖宅也守着习惯的生活方式，或许他们也不愿成为生活不易的子女们的累赘；也有老人如候鸟一般，天气寒冷时住到城镇子女的暖气房去，暖和了又回到村里居住。孩子也一个不剩了，因为在村里没法上学。空置的、残破的、近乎倒塌的房屋院落比比皆是。相距不远的大营盘村，全村更是只剩五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村里行走，满目残败，荒草凄凄，如入无人之境。

即使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村庄现状归结为农民外出工作。要寻找生计，提升生活水平，要改善和发展，他们有别的选择吗？滞留于贫瘠的土地，流连在朽败的长城，他们有什么前途？

长久以来，中国农民被视为有着“贫，弱，私，愚”特性的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这种状态一如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乡土中国》）。承认我们的国民性特点的同时，更要思考这种“土气”是如何形成的。毋庸讳言，制度安排与政治文化传统是造成农民乃至整个国民性状的根本原因，更准确地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互动互构、交互作用形成了今日的民情。

经历了长久的城市与农村的分隔状态，所谓城乡二元已经不止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成为一种思维结构。剥离了农民的权利所进行的城镇化，是缺少主体及其自主选择权的城镇化。长久以来的农民的弱势地位、底层状态、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并非由于他们天生低能、无能，不会为自己谋划，过不好自己的日子；而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造成他们的结构性底层位置。这是制度使然，也是观念使然。解决农民问题，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给农民还权赋能（empower），即还他们本应具有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换言之，走出农民和农业的困境，避免乡村社会的颓败之势以及同时存在的大城市病，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须有保证全体国民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安排。

乡村复兴/新农村建设的理想与实践

所谓“三农”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上议事日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乡村建设”、“社区营造”为题的项目不断涌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推动和参与乡建的人们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企业家，有规划建筑师，有志愿者（组织），有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有社区工作者，也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意义重大，他们的努力艰苦卓绝，但他们也每每遭遇难以摆脱的困境。

坊口村的乡建项目算是进展比较顺利的，一百多户房舍已经收建了三十个左右，重建的民宿保留了原有结构和风格，却又现代、舒适，而且不拘一格，可以满足不同档次的需求；已经有团体和散客不时光顾。开发设计方与村庄和村民建立了比较和谐的关系，村里设立了老年食堂，请专人做饭，年满七十岁的老人每天免费吃中、晚两餐。有企业家资金的投入，有艺术家也有志愿者参与了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等。县里出资正在修建通往村庄的道路；周边也有村庄前来探讨重建之路；……。

乡村重建是一项重要事业，需要市场、社会、政府的合力合作。这一过程非常艰难，人们脑海中常存这类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为何成不了事？为何做不了社会中坚？中产阶级为什么难成气候？企业家精神为什么无从养成？创业、创新为何这么难？从乡建者们的经历可以获知，难在权力的逻辑绑住了他们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和胆量。试想：乡村重建，那是真金白银的投入，那是智力心血的付出，若没有明确的产权保护，没有可持续的利润收益，没有对发展的基本预期，谁敢投资？谁又承担得起巨大的风险？而当前的官方逻辑却是，勤政不如懒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干事；天下无事最稳定也最安全。

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的双向流动。能够融合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乡建何以可能？乡村应该如何发展？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况且中国的乡野如此广袤，地理地貌如此多样，地域发展如此不均衡，任何一地甚至一村的经验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套用。更何况，这一系列难题在基本产权不确定不清晰、农民基本权利未受保护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艰巨。

乡村社会发展与社区重建是多主体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农民更是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体的地位。因而，让农民拥有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的财产权，他们在此基础上方可自主经营，自由交易，自愿合作。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留乡或返乡，前提是他们必须与城市人一样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 protection，这也是解决整个中国转型问题的根本所在。

一点观感，决非判断；只是提出问题，并无指点江山。

前路漫漫，探索无边。

2019年10月18-19日行走坊口等村庄，22日记于清华园。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爱思想网2019年11月01日）

青海祁连行

鲁 青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旅行家、诗人、散文家，1982年生于山东青岛，曾做过会计，SAP软件咨询高级顾问，基本遍游了中国。此文为他游走青海祁连山麓的散文，呈现给我们的是这一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主要水资源产流地中的戈壁、雪山、草原、胡杨、牛羊、牧民……还有大漠孤寂的远古沧桑，从中体悟到大自然的粗犷与神秘，带给我们的是对祁连山的敬畏与呵护。本文曾被多家杂志转载。

五月的春风里，在张掖，见到了我的兄长杨献平和诗人倪长录，我们同去青海的祁连。

远行第一日，我们按照柯英的计划先转车去民乐，可路上慢慢塞满的客车，总要在很多路过的车站逗留半个小时以上，闷热，烟气夹杂羊骚的气味，充满着半闭的空间。路旁两行整齐的树，外面是荒芜的沙石滩，从出发地武威过山丹的路上也尽是这种景色，相比寻常见的荒漠，这更称得上是戈壁。

树梢返绿的嫩芽不经意间被抛在了车后面，终于等来的春天忽然间就没了踪影，灰色的草铺满在灰色的山坡上，还是去年冬天的模样。四周并没有一棵树木，找煤的山民留下黑黑的窟窿，阴森，极不协调。我们坐在歪歪扭扭的客车里，沿着山脚下水沟边的蜿蜒穿行，沟底灰白的冰片，还没有来得及融化。

以前我并不知道扁都口，抬升的海拔让我总担心心口会疼，自从乘火车站立到兰州，身有余悸数月，车外的风和我心跳都在加快。又过了很久，沿着起伏的山路的方向，柯英指着谷里的村庄，告诉我那就是古城峨堡。

好大一片金黄的草原，清风吹过，羊儿各自吃草，那些身披着黑毛的，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牦牛。远望黑点白点交替点缀得黄草一片，依然空旷的舒坦，近处和很远处的土墙和铁丝栅栏，没有一只牛羊敢从那里越过。而那些正当过路的羊群被突来的车鸣声冲散，先是站定望一下陌生的我们，然后像流水一样自然笼合，在柏油路面略显柔弱的步子，会在远处高高的山岗上行走自如。

这时候已经到了阿柔乡，迎面一人骑马奔来，挡住了我们的班车，迎面长长的柏油路上正有藏民的赛马比赛，旁边围住的人群，中间是两个大汉在摔跤。我探窗远望，一位骑马的牧民轻松地走过，后面紧跟着一只黑色的藏獒，悠然的节奏，比过去的一切都自然。

一道弯过后，还是一道弯，清清的八宝河水在往年的冰下流淌。河床上留下的冰面上，长着矮树模样的沙棘。祁连就要到了，可以看到山坡上一片片高高挺拔的青海云杉，依稀可以见到扒在土里粗壮的根。

有树的地方就有了人家，一条大街横穿斜坡，那就是祁连县城。唯一的，陈旧，灰暗的祁连宾馆，总可以忘却城市的喧哗。回家乡宣传部工作的小张姑娘介绍了可以去玩的地方，我说比乡镇还小很多的县城，我们七个人走在大街上，突然就热闹了很多。

下坡后，就是八宝河畔，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粗壮的树。我曾远远望见深秋的胡杨林，那是沙漠边缘一片老态龙钟的模样，日久风沙的摧残，年轻的树龄，未老先衰的粗糙的长相，总觉得可怕。而今，我终于在五月的祁连腹地，近距离见到了参天模样的胡杨林，沿湿地长长的一道别样的风景，一簇簇细小杂乱微霜般的枝丫簇拥在周围，我靠近过去，他们还是深冬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折了细枝的一梢，干枯；再折一段，还是干枯；我狠狠心折掉了更粗的一根，树枝是死掉了，但树还活着。我也注意到在远处一小片开垦的孤立的田地中央，或许早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折断的粗干，如今树皮被剥得精光，像露着白骨的躯干牢牢固定在那里，禁不住想起那句话，生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水边也有一棵去年被大火烧过的胡杨王，干瘪、漆黑的一侧，一个人个头大小的树洞，刚好可以站在里面，突然就会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而胡杨树更像是坚强的西北汉子，年年被强风吹过，它忍住痛疼，始终没有倒下去，坚贞不渝地对着远处洁白的雪山。正对牛心山的，是一个叫卓尔山的红色断面，我第一次见到丹霞地貌，站在水边呆呆地仰视并不很高的山顶，我问柯英得知，春来时，牛羊可以从山的背面爬上去。

大概八宝河下有丰富的石灰石矿，巨大的矿土堆，残缺难看的洞，并没有隔离和保护措施，最终留下的是山河大地难以愈合的伤口，甚至临近的草木皆会死去，而对于每一个外来游玩的客似乎也无可奈何。

天黑之前，我们回到住处，简单的菜肴，几个人喝光了一瓶葡萄酿造的白酒和一瓶乳白色的奶酒。

第二天，我们租车向北，那时候一直感觉在向东走。沿着发源于景阳岭的八宝河顺水而下，去找黑河的源头。到了黄藏寺，原本藏民的寺庙早已经搬迁，如今的黄藏寺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村委会就像一间寺院，高音喇叭奇妙地夹在高高的胡杨的枝丫上。

翻下一道道坡，身后的那座山渐渐显得高峻，黄藏寺也就看不到了，前面的河沟又深又宽，可以想象曾经的河水多么的凶猛。河床上长着稀疏的树和片片沙棘，混浊的河水从它们身旁流过。

但我不知道黑河为什么叫黑河，黑河的源头却流淌黄浊的水，大概清凉的雪水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冲走了阻挡他们的泥土吧。

献平带我钻进沙棘层，贴到水边拍照，河底的石头让湍流的水势更加磅礴。细心的柯英在水边打捞了一大块并不纯的祁连玉，抱起，有些沉重，但冰凉爽遍全身。

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另一个山沟走来，那该是发源于托赖山腰的托赖河吧，远远望去，上游更多是石头，而不是沙子，不远处直立的悬崖下一片挺立的胡杨林，此时更加神秘，深远。

水边牛耕的回族汉子停下来，和牛一起善良的望着我们。即将种下的土豆能给他们带来一年三千元收入，村民悠闲的生活并没有更多的奢望，有时候碰到有外来捡石头的游客便打听石头的价值，然后会叹息自己的不懂，其实我们也不懂。

我们带着玉石回县城，然后要去寻找雪山深处的石林。

我曾记得在异常天晴的日子，在腾格里的边缘能望见斑白的祁连山顶，有时候会以为那是水干后残留的盐，反射着太阳惨白的光。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大概几十里，就是青海湖方向，离着祁连山顶的积雪越来越近了。

祁连县城仿佛就在雪山脚下。生活在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喝着祁连山的雪水，献平说：雪水贯串他们的一生，如今3900米的雪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竟然没人知道拐进山的路，手机也没有信号，模糊的判断，在青海云杉的指引下走进深山，眼前的雪山

却越来越远，阳光普照下，原来清晰的雪山，走近了却见不到，只有山阴面的沟壑厚厚的白冰，又或者是未化尽的积雪，是祁连的风把它们吹进凹处。经过几个小时的翻越，对面的雪山还是那么远，祁连雪大概是不能用手触摸到了。远处山坡的牦牛静静地低着头吃草，它们没有理睬我们这些在雪山深处寻找雪山的人。

牦牛吃草的下方，远看有一水泥柱，我们决定一起去看是否有指示的路标，翻一个深涧上去，干净的柱子，大概是卫星定位的坐标，只能模糊看出来是4800米的海拔，而石林大概仍然在我们最开始走的方向。我竟然没有高原反应，决定小跑一段试一试心脏承受能力，更快的气喘吁吁，以及山顶的冷风，顿时觉得要腹泻，便让其他人先去翻过山头，只有献平在不远处等我。献平自小在南太行的山里长大，而我先前只爬过一次山，他斜绕上山，我担心赶不上，便想直上，走了一段才发现根本没有路，看似并不高的山，人显得很渺小。粗砂砾的山面上，满是刺矮灌木，其他人好像很远了，除了风声我并不知道他们的方位，顿然心慌起来，伸手抓了一把刺，几米高的山头竟然上不去。我正犹豫要不要回到山谷绕过，献平回来找到我，蹲下来，伸手拉我爬上去，然后鼓励我陡坡不要怕，大胆往前走身体就平衡了，那些山坡上很直的线都是牧民走过的路。

我们沿着模糊的线前行，其他人出现不远处，但似乎翻过一个山头还有更多的山头。突然起了大风，远处迅速赶来乌黑的云彩，都没来得及惊呼，冰冷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敲打在我们的头顶。因为先前并没预料，伞自然是不带的，四处探望，有人迅速发现了一处崖口凹陷处，大概能站进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跑过去。并没有理想的避雨场所，让身体的一部分躲过大风雨，已是万幸。

风过之后，又要晴天的样子，看看表已近下午四点，虽然仍然觉得寻找石林的大概方向没错，但是商量过后，决定立即返程。

深山也有一个养鹿场，因为会有野猪的出没，便没有去。正如八宝河畔石头刻着的字：天境祁连，大家在那里欢快地待了两三天。

按照来时的计划，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会在冷风中的峨堡镇逗留。远远地看着在祁连草原尽头，雪山贴着浓密的乌云，又或者突然透出一道强光，烟雾游走，我又能看到虚无缥缈的祁连雪峰。

筑于元代的峨堡城，原是古丝绸之路（西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我们穿过村落的巷口，在狗吠声中，一道土墙出现在眼前，这边几个牛粪模样矮小的羊圈，脚下的垃圾一片。钻过当年的古城门，冷风迎面吹透全身，凉凉的全身肃穆庄严的对着这个四方的遗址。当年，隋炀帝曾派太仆卿杨义臣率兵驻守在浩门峡谷，也把守着这里。

四方城里只有风声，脚下除了碎草就是羊的粪便，睡过士兵的地方，千年之后的夜里就睡着白天四处吃草的牛羊。对山的一侧，一间屋子的模样，烽火台般的结实，或许那是将军的办公室，现在是冷风吹不到的地方。最高的城墙还在，风蚀的粗糙，碎壁残垣之上可以望到那片无边的草原，也可以看到去西宁的路，在没有汽油味的古代，远处总是很遥远。

午饭就在城墙外的小餐馆，长录说他独自一人，顺城墙摸索半个古城，那一次他说对着一盘卤肉，他喝下了平生最多的酒。献平在迅速地写诗，然后诵读，兴致来时，便要求每个人用“青海的祁连”作文。冷风还是在吹，我们原路返回张掖，商量着去看更大规模的红砂岩丹霞地貌，那时候，只有几个村民用一棵细长的树干挡在一个路口收费，在其他位置不但没有手机信号，也人迹罕至。

（来源：《青海国土经略》2019年第2期）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